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十期 目 录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谭 枫 (5)

积极办好中小工业.....江 虹 (11)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 (16)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赛福鼎 (20)

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

——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 (27)

建设理论队伍 推动群众学习

.....天津市染料厂党委会 (31)

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35)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评投降派宋江.....安 群 (39)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闻 钟（46）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杨荣国（52）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56）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59）

思 想 评 论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石 平（61）

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巴 山（65）

用什么标准要求学生？……………上海市本溪中学党支部（68）

科 学 史 研 究

同位素年代学与人类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

……………朱炳泉 周新华（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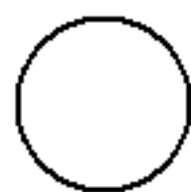
国际述评：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梁 效（81）

☆ 十 月 一 日 出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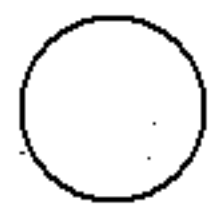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语录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习理论 总结经验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谭 枫

近几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展很快。农村广大群众和干部把学大寨看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自觉性越来越高。大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在全国各地到处传播，大寨式的大队、公社遍布乡村，还涌现出一批大寨式的县。“奋战三、五年，普及大寨县”。无论南方、北方，内地、边疆，山区、平原，干部和群众都在这么说，也在这么做。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的面貌。农村中广大群众和干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足，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农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正在加快，抗御自然灾害的力量不断增强。农业生产在连续十三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早稻又获丰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发展壮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大寨道路越走越宽广。

自从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经历了同刘少奇、林彪两次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大寨在斗争中越战越强，大寨的经验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在农村中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如何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如何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缩小三



大差别创造条件？大寨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全国农村亿万干部群众，把大寨的经验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战天斗地斗敌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为着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这是农村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方面，各地也都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器，把这些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特别总结好如何建设大寨县的经验，进一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这是在农村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

实践证明：象昔阳县那样建设大寨县，领导是关键。一个县，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这个班子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搞马克思主义，团结一致，能够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有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大寨的经验就能在全县迅速推开，普及到每一个社队。昔阳所以能很快变成大寨县，关键就在这里。继昔阳之后，全国各地出现的许多学大寨、赶昔阳的先进县，关键也在这里。大寨人常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一个大队是这样，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省都是这样。那个县的县委能够自觉坚持继续革命，那个县就有希望很快变成大寨县；那个地方注意抓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那个地方大寨县就出现得多，发展得快。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县委带头学大寨，根本问题在于把县委的思想政治路线搞对头。路线端正，就能抓住学大寨的根本，大寨经验才能学得到，推得开。讲路线，就要讲党的基本路线，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寨执行的是毛主席制定的基本路线，大寨所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寨所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作。学大寨，就是要学这个。这样学，才是真学到了根本。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县，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经历：开始只把大寨作为生产典型来学，学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学到根本上，结果学来学去，人心依旧，河山未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吸取经验教训，端正了路线，广泛地发动干部群众学理论，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一学一批，干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资本主义



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了。这就说明，县委的路线是不是正确，决定了这个县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和速度。

许多同志说得好：农业学大寨，步子快不快，不在群众在领导，不在条件在路线。如果领导的路线不正确，肩膀是软的，没有战斗力，抓阶级斗争胆小，抓生产斗争劲小，听任资本主义泛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起不来，条件再好也迈不开大步。相反，领导的路线搞对头了，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同昔阳山连山、地连地的寿阳县，是个多年没有变的穷地方，由于学大寨、赶昔阳，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了资本主义，两年就打了翻身仗。江苏有个宿迁县，地处淮北沂、沐、泗河下游。那里原来大部分是盐碱土、薄岗地、砂礓滩，易旱易涝，也是个有名的低产缺粮县。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两百斤左右，国家每年要给这个县供应五千多万斤粮食。后来，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把县委一班人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抓住根本学大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结果，五年迈开五大步，头一年实现粮食自给，第二年向国家卖余粮，第三年粮食生产过《纲要》，第四年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一倍多，第五年在遇到重大灾害的情况下，总产量仍然比第四年增长百分之七以上。今年三麦又比去年增长五千万斤，一季的增产量超过去年全年的增产量。许多这样的事实都说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要领导的路线搞对了，对阶级敌人敢斗，对资本主义倾向敢批，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条件再差也可以改变，困难再大也能够克服，学大寨就能跨大步。

县委的路线端正，才能认真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复杂、尖锐的。在集体经济内部，劳动力如何支配，种植计划怎样安排，农副产品从什么渠道出售，社队企业如何发展，集体收入怎样分配等等，都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社队领导班子里面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农村基层干部，妄图通过干部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活动打掩护、发放通行证。这就需要县委领导同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以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



的问题，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不致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加以批评，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加以赞同。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就会注意坚持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正确地带领基层干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搞好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那些学大寨的先进县，正是这样做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扎扎实实地抓好后进单位的转化工作，也是建设大寨县的重要一环。建设大寨县，应当是社社队队学大寨，大寨花开遍全县，每个社队都能象大寨那样，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仅要抓先进，而且要抓后进。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普及大寨的经验，建设大寨县，而有的地方停留在只有少数先进社队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县委领导同志是不是认真抓后进社队的转化工作。湖南安乡县原来有五个公社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在革命和生产上都拉了全县的后腿。后来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干部，深入下去，重点帮助他们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使全县学大寨运动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地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地发展。一九七四年这个县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皮棉一百四十二斤，生猪饲养量一人一头。吉林伊通县也是由于在抓先进的同时，重点解决了五十二个后进大队的问题，使全县二十二个公社，一个上《纲要》，二十一个过“黄河”。无论一个县还是一个地区、一个省，都应注意抓后进。抓先进带后进，抓后进促先进，先进后进互相促进，大寨经验就能由点到面迅速地铺开，就能加快建设大寨县的步伐。

毛主席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满足于几个先进典型，不抓后进，这样，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各方面的差别就会扩大，不利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为什么要抓先进？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为了通过典型推动面上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后进单位不学先进或学得不好，那就要推它一把，促一促，帮一帮。所谓后进，无非是那里工作落后一些，问题多一些，困难大一些，集体经济不那么发展，社会主义阵地不那么巩固。这主要同那里领导班子的路线有关。这种状况长期没有多大改变，又往往是由于上面的干部去得少，关心不够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同志到这些单位去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当然比较艰苦，可能要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个考验。“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许多县委的同志正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克服怕苦、畏难的思想，深入到后进单位去蹲点、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他们的实践说明，后进单位也并不难改变。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能找到那里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许多事实都说明，后进单位的群众并不落后。只要我们相信群众，相信那里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要革命的，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向干部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发动他们认真看书学习，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并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帮助那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集体经济，那里的面貌就能迅速改变。

领导干部到后进单位去，既能帮助后进单位改变面貌，又有利于领导干部改变精神面貌。我们的领导干部，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背起背包，扛着锄头，到艰苦的地方去，同农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研究农业学大寨的问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许多干部下去以后，官架子打掉了，唯心精神受到了冲刷，同贫下中农的感情加深了，新型的干群关系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干部群众一条心，团结战斗，又能促进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这种作风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的。

建设大寨县，步子如何走？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可行的远景规划。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情形大不一样。这种规划的好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发动群众制订远景规划，能使广大群众看到远大目标，从而激发革命热情，鼓舞战斗士气，有利于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干部群众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干大事业，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有了规划，还能够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不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有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甘肃民乐县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了认识，通过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搞了一个十年发展规划，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



志。他们抓长远，促当前，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就平整条田六万五千亩，修成中小型水库六座，渠道八百多条，长达三百三十多公里，育树苗六千多亩。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制订规划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各地都在发动群众制订出自己的规划。队有队规划，社有社规划，县有县规划，不仅规划如何改变山河面貌，而且规划如何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提出发展规划来，并且领导群众为之奋斗，一步一步地付诸实现。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很有好处。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保守思想也会常常出来作怪。这种思想在领导班子中表现出来，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小二私，这就带来许多弱点。受了这些东西的影响，往往站不高，看不远，看不到群众、集体的力量，有点成绩就自满，遇到困难就低头，胸无大志，不敢想不敢干。“只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才能迈开学大寨的步伐。”这是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共同体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不断地清除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才能够想得远，干得大，不断前进。

大干社会主义农业靠什么？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靠亿万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大寨精神。全国数百个学大寨的先进县，无一不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结果。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藏高原出现上十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的县，就是最好的证明。依靠群众胆子大，自力更生办法多。制订规划，实施规划，都要充分发动群众，都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是学大寨的力量源泉，大干快上的可靠保证。“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通过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把农村中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各行各业的力量组织起来支援农业，那末，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办得多快好省。在农业战线上，我们还有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还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我们深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亿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只要我们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寨式的县一定会普及到全国去，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步伐一定能够加快。



积极办好中小工业

江 虹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工业战线呈现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我们不仅建设了和正在建设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而且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在城市和农村象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起来,日益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实践证明,毛主席所制定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认真执行这个方针,有利于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毛主席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积极发展中小工业,包括社队办的工业,有利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主要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一批大型企业,并加强对这些企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型企业需要大量投资和大型设备,技术要求高,从一个省、一个地区来看,由于受资源、资金、设备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办得很多。要多办,就必然伸手向中央要投资,要设备。相反地,中小企业投资少,设备容易解决,技术容易掌握,建设时间短,资金周转



快,积累也快,地方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点,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需要与可能因地制宜地去办。这样,不仅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小城镇,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而且可以更好地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中小企业一个一个地看起来规模小,产量不大,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小企业办多了,加在一起,产量就大了。拿化肥来说,目前江苏全省小化肥厂生产的合成氨相当于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四倍。如果只搞大的,不搞中小,一条腿走路,工业的发展势必要少慢差费。

中小工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农村社队办的工业更是如此。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辽阔,资源丰富,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办工业的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只要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进一步调动农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队工业一定会更加多快好省地发展起来,并促进整个工业更快地发展。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从地方来看,也必须多办中小工业。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江苏省有相当大的地区是粮棉高产地区,复种指数很高,还有些地区地多人少,这些地区劳动力紧张,劳动强度大,都迫切需要以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机器从哪里来?光靠大型企业生产的机器是不够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两条腿走路,除了大的农机厂外,县、公社、大队都能分别生产一些小型农机具或者进行修配。我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各地地形、气候和耕作制度有很大不同,对农业机具的需要复杂多样。以中小工业为主,可以在数量上、品种上和性能上,更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农业的支援也更及时,更方便。江苏省近几年来,每个地区都建立了拖拉机厂,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生产型号不同的拖拉机,例如,徐淮平原地区生产中型拖拉机,沿江水网地区生产小型手扶拖拉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利于较快地提高全省农业机械化水平的。

无锡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县,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



扰，地方工业发展缓慢，不少地方是“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买不起，机器坏了愁修理”。一九六五年，全县只有六台拖拉机。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增产粮食，多做贡献，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农忙季节争劳动力的矛盾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水利电力设备、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等。无锡县的干部和群众没有等、靠、要，而是根据毛主席制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县社队工业，用自己生产的机器武装自己。一九七四年，全县已办起一千六百多个工厂，工业总产值接近两亿七千万元，不仅能生产一般中小型农具，而且能大量生产拖拉机和柴油机了。现在，全县已有机械动力二十一万马力，平均每四亩田有一马力，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九年来，建电灌站九百九十四座，修地下渠道一千四百四十六公里，百分之九十八的生产队通了电，基本上实现了耕作、脱粒、植保、排灌、粮食和饲料加工等项目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六十七斤。

围绕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办好中小工业，逐步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对工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促进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在为农业生产解决排灌、农副产品加工、耕作和运输机械时，需要发展机械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解决农药、化肥时，需要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建筑材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又促进煤炭、冶金、电力和其他原材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群众把这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形象地叫做“农字当头滚雪球”，是很恰当的。

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在发展大型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还是两手向上，只热衷于搞大的、洋的、全的，轻视中小型企业，这反映了工业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鼓吹“大、洋、全”，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他们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需要继续批判。同时，也要教育我们队伍内部的某些人，改变那种迷信“大、洋、全”，轻视中小型企业，轻视群众的错误思想。迷信“大、洋、全”的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懂得，大是从小来的，小可以转化为大；洋是从土来的，土可以转化为洋；全是从不全来的，不全可以转化为全。常州市生产手扶拖拉机，曾经订



过两次“大、洋、全”的计划，都落了空。后来，他们把基点转到自力更生，挖掘老厂潜力方面来，利用水泵厂搞总装，柴油机厂搞动力，锻造厂搞钣金件，农具修配厂搞齿轮，十几个单位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生产拖拉机配套，两年时间就形成了年产三千台手扶拖拉机的生产能力。经过大搞技术革新，填平补齐，现在手扶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一万五千台。这个市的经验表明，在统一规划下，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围绕若干主要产品，打破行业界限，把有关厂组织起来，搞好协作，形成“一条龙”生产线，同时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是一个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好办法。常州市在组织几个小厂生产拖拉机的时候，有人说桌子上不能唱大戏。工人们响亮地回答：“一张桌子小，几张桌子拼起来就能唱大戏”。这句话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现在，江苏省不仅有一个市范围内的“一条龙”协作，而且出现了全省范围的“一条龙”协作。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协作，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挖掘原有企业的潜力，发扬穷办苦干的革命精神，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办好中小工业，关键是抓路线，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放任不管，让资本主义倾向自由泛滥，是错误的。但缩手缩脚，不积极支持新生事物，不努力发展中小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也是错误的。中小工业的特点是：分散、数量多，所有制不同，有全民所有制，又有集体所有制。在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条件下，如果路线不对头，很容易受价值规律支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从许多地方发展工业的情况来看，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是支农第一，还是赚钱第一，突出地表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论在大型企业或中小型企业中，这种斗争都将是长期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既要用积极的态度办好中小型企业，又要自觉地认识到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因势利导，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

为此，必须加强党对于中小工业的领导。近几年来，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来，许多地方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资本主义倾向，针对每一个时期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整顿，对



于保证中小工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今后，必须继续加强党对中小工业的领导，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它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队企业有如山花烂漫，正开遍祖国大地，显示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它的发展对于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缩小三大差别，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人民公社经济，现阶段一般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将来，要逐步过渡到大队统一核算和公社统一核算。实现这种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社、大队的经济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而要壮大公社、大队的经济，除了全面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外，必须大力发展社队工业。无锡县社队工业发展得比较快，它的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的比重也比较大。一九七四年，公社、大队两级已经占三级固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工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强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把它办好，使它从少到多，不断发展和壮大。“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社队企业的发展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分清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和非主流方面，“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我们切不可忘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建国二十六年来实践证明，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工业发展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步子就迈得快；相反，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业发展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步子也迈得慢，甚至要停滞、倒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总结发展工业，包括发展中小工业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按照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中小工业办得更多更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昔阳县委员会

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紧密联系实际，分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研究了如何继续抓好后进队的转化问题。为此，县委派出了二十多个调查组对后进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重点帮助这些队的干部群众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端正方向、路线。在这个基础上，专门召开了后进队学理论汇报会议，以大寨为榜样，找差距，揭矛盾，促进大干快上。这样一抓，一批后进队的精神面貌明显改变，奋起直追，迅速赶了上来。它们的进步，既影响了中间的，也震动了先进队，大家都感到形势逼人。经过这段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必须端正思想，改进自己的工作，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是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也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建设大寨县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们陆续抓了一批后进队的问题。这些队大多数是“老大难”单位，人口多、土地广，潜力也大。经过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有的已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先进和后进是比较而存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深入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就做到了先进更先进；有些队变化不大或停步不前，掉在后头。据我们初步调查，按照建设大寨式大队的要求，全县目前仍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大队处于后进状态。这些队多数是偏僻山区的小村、小队。几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下，这些单位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集体经济还不够壮大，无产阶级专政也不那么巩固，生产发展的步子不大。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片面地认为，只要全县多数队上去了，这些小村小队关系不大，因而出现了只重视抓先进队、抓大村大队，而忽视抓这些后进队的现象。结果，与多数队比较，这些队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影响了后进队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也使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得不到全面平衡的发展。



要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首先就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后进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体会是要坚决丢掉一点论,坚持两分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善于发现后进队的积极因素,调动、扩大和发扬后进队的积极因素,促进它们向先进转化。

后进队有没有积极因素,有没有可能向先进转化呢?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同志头脑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对后进队总有一种埋怨情绪,老是怨这些后进队干部不努力,群众落后,工作不好领导。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后进队的实际情况的。相对来说,后进队的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花气力去调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在后进队的群众中同样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几年来,在帮助后进队的工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后进面貌;那里的多数干部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本质上是要革命的。而且即使在这些地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分子也是不少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样在不断涌现。关键在于我们县、社干部要丢掉一点论,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从本质上发现和调动这种积极因素和潜在力量。我们县皋落公社有个南庄大队,长期处于后进状态,被人们认为“板上钉钉,没法变”。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县、社干部转变了思想,派出工作组帮助这个大队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表扬了一批热爱集体的先进社员,使这个大队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调动了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学大寨迈出了新步子。象南庄大队这种明显转变的事例很多,它都说明要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首先就要克服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才能真正深入下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解决问题。

事实上,先进和后进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先进队就是由原来的后进队转化过来的。就以我们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南埝、武家坪和石坪等大队来说,当初它们也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学大寨以来,由于这些大队的党支部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这说明,后进队转化为先进队的过程,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斗争,不断发展和壮大那里的积极因素,逐步克服和消除那里的消极因素,使积极因素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发现和调动积极因素,只是消极地埋怨、批评和指责,那就会越批越糊涂,越整越泄气,挫伤后进队干部、群众向先进队转化的积极性。因此,解决后进队的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抓,一是要揭露矛盾,批判错误的东西;否则,就看不清问题,分不清是非。一是要发扬积



极因素，支持新生事物，鼓舞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斗志；否则，就不能促使其内在因素发生作用，从后进向先进转化。这都是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所必需的。

后进队的问题不管表现形式怎样，实质上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在帮助后进队的工作中，我们始终是从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入手的。大寨的道路，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我们强调学大寨学根本，首先指的就是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一条，无论对于那种类型的社队都是适用的，就后进队来看，显得更加需要。有的同志过去所以对帮助后进队转变缺乏信心，主要是感到那里阶级斗争复杂，不好解决。其实并不是这样。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后进队前进的动力。许多事实说明，后进队所以后进，并不是由于那里阶级斗争特别复杂，而恰恰是由于那里的领导班子没有能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造成的。一旦他们端正了方向、路线，敢于狠抓阶级斗争，情况就会迅速发生变化。洪水公社东沟大队原来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队党支部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方向，带头自觉革命，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反复批判资本主义，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面貌焕然一新。象东沟大队这样抓住关键去解决后进队的问题，那么后进队的转化既不会慢，也不是那么难的。过去，我们县、社两级党委有的同志也抓后进队，但是由于很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真正抓住方向、道路问题，帮助后进队的同志从两条道路斗争中提高认识，而往往是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结果，使后进队的问题越来越结成了疙瘩。这种状况目前有了改变。

抓好后进队的阶级斗争，重要的是要帮助这些后进队建设一个敢反资本主义，敢干社会主义的党支部。后进队的领导班子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学习理论不够，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因此，必须重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后进队的干部。我们在帮助后进队的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即：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用继续革命的思想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干部，使他们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的思想。进行这些教育的目的，着重是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我们既要敢于把那些能够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大干苦干的干部，及时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又要注意保持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对于后进队



的干部，换人不如换路线、换思想。干部做工作，有个学习、熟悉和提高的过程，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从斗争实践中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如果一犯错误就撤换，那是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也不利于后进队的转变的。

要改变后进队的面貌，还必须帮助它们逐步改变生产条件。一般说来，后进队也是穷队，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单薄，发展生产有一定困难。我们在充分调动后进队内部积极因素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国家拨给农业的机械设备优先照顾后进队；县、社举办的大中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优先考虑后进队的受益，联办工程由县、社多负担投资，让后进队多出工，少出钱；县、社企业同后进队联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由县、社投资，大队出工，收入分成；在有条件的公社，从社办企业积累中抽调一些资金支援后进队，等等。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条是一定要有利于发扬那里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再一条是一定要着眼于发展集体经济，促进那里改变生产面貌。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是很重要的。大寨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假如当地的干部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向困难作斗争，那么，国家和集体给的支援常常不能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甚至助长一些人的依赖思想。但是，当着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已经充分调动起来的时候，给予必要的经济上的帮助，就有利于尽快地改变落后面貌。

后进队的问题发生在基层，责任在我们县委领导。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我们的情况怎样呢？总的来看，对先进队注意得多，对后进队就差些。现在的一些后进队，大部分在边远山区。战争年代，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是当时全县的先进地区。解放以后，我们进城了，对它们不重视了，去得少了，抓得少了，放松了领导。群众批评说：“战争来了，你们吃在山区，住在山区。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有些干部就看不起山区了，不到山区了。”这个批评，启发我们认识到，对后进队的态度问题，实质上是县委思想革命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不是后进队“难办”，关键是我们县委对待后进队的认识和工作作风能不能端正。我们针对后进队的问题，从县委身上找原因，发动干部群众给县委提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并带领一批得力干部，深入到后进队蹲点。这样，促进了县委自身的革命化，也带动了后进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推动了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深入地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赛 福 鼎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二十年，是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的二十年，是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各族人民以空前的革命热情，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与进行颠覆和侵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各族人民遭受残酷、野蛮的压迫和剥削的贫穷落后的旧新疆，变成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日益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新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二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就没有少数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今天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疆。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是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最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人：一种是人数极少的剥削者，一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正如列宁所说：“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新疆解放以前，民族压迫的实质，就是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和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勾结在一起，对各族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是造成民族对立和民族隔阂的根源，也是造成各少数民族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要彻底解决民族问



题，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使各民族走上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握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二十多年来，新疆社会面貌的每一次改变，都是经过大的革命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的。解放以后，首先摧毁了各级反动统治机构，把政权夺回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历史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压迫和剥削。紧接着，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封建地主、牧主及一切民族反动派，利用他们残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常常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甚至同国外的阶级敌人相勾结，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党的领导下，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剥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谓“维护民族利益”的外衣，揭露阶级斗争的实质，使群众不受他们的欺骗和愚弄，并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粉碎了内外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批孔和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在革命的带动下，各条战线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同烂漫的山花，开遍天山南北。事实证明，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新疆的大好形势。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动的民族上层一唱一和，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例如，在如何看待革命条件的问题上，他们总是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这方面或那方面落后的东西，而不愿首先看到各族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特别深重、革命要求非常强烈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事实上，各族人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最重要的条件。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经热情赞扬“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的按语），并驳斥了那种认为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现合作化的谬论，批判了轻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观点。



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新疆各族农、牧民，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全国五亿农民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实现了农牧业合作化，随后又以基本上相同的步伐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认为少数民族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的观点，在以后的各次革命运动中还是时有发生。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处理好各民族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矛盾同样是阶级矛盾，主要的斗争同样是阶级斗争。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新疆地区的落后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各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阶级要求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光明大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护身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不可分离的伟大祖国。所有这些，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是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团结进步的根本保证。离开这些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就要背离新疆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离开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离开各族劳动人民共同的阶级利益，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民族问题，就必然要滑到民族主义的斜路上去，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各个民族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有它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某些方面，就有其特殊性。在充分遵守共同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特殊的一面。如果在工作中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那就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于发展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主席特别重视，谆谆教导新疆的干部要努力做好经济工作，做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进行反修防修斗争，逐步消除各民族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在新疆这样一个过去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践踏、蹂躏因而十分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那些对少数民族抱轻视态度的人，是大有疑问的。他们总是强调新疆经济文化落后，认为搞建设不能高速度，只能慢慢来。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新疆固然一穷二白，可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介绍一个合作社》）何况，辽阔的新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一千多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只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完全能够高速度发展的，任何悲观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新疆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事实，已经做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解放以前，新疆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现在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矿企业。一九七四年的工业产值，比一九四九年（那时主要是手工业）增长了二十多倍，比一九五五年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了将近四倍。仅原油一项，现在新疆一年的产量，比解放前夕全国一年的产量还多好几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各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步成长壮大。农业生产根本改变了解放前用木犁耕地的落后状况，正向着机械化的方向阔步前进。与解放前相比，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都扩大了一倍半以上；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粮食产量，今年与解放前夕比较，预计增长近三倍，牲畜总头数增长一倍多。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自治区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走进大学，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自治区成立时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一倍半以上。中专和中学的学生，增加近十三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医疗卫生方面，医院和病床比一九五五年增加六倍多。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在农牧区，现在农牧区医务人员占全自治区医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病床占百分之七十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牧业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遍及各农村牧区，共有一万多名。旧社会农村无医无药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维、哈、蒙文图书和中小学



课本共发行六千四百一十多万册，平均每年发行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点二倍；维、哈、蒙文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共发行二千八百多万册，平均每年发行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十点三倍。

新疆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事实生动地说明：各族人民群众只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此，除了要解决好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好要不要实行和能不能实行自力更生的问题。那些对少数民族抱轻视态度的人，往往强调新疆落后，情况特殊，认为搞经济建设不能自力更生。二十多年来，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在同这种错误思想的不断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当然并不是不要援助。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疆，由于过去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一些省、市更为落后，在解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和兄弟省、市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断给了大量援助。这种援助，是过去新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今后还是必要的，特别是人力的支援更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只有充分发扬新疆各族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国家援助才能发挥作用，决不能因为有了国家援助，就滋长懒汉懦夫思想。要不要自力更生，实际上是要不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要不要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逐步提高新疆经济的自给水平，并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问题。那种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躺在国家援助上当伸手派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搞好民族团结非常重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战胜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侵略活动，战胜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小撮民族反动派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新



疆，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就不会有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各族人民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真正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建立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斗争中，携手前进，并肩战斗。这样的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为了搞好民族团结，多年来新疆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不断进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增强民族团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为了搞好民族团结，必须坚决执行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各自治州、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实施。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利于调动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潜力，增强各民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自治区成立后，努力进行党的建设，发展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现在全区少数民族党员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了五点八倍，少数民族干部增长了一点零五倍。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自治区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和经济文化部门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党委委员中，少数民族出身的占百分之六十五。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与汉族出身的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并肩战斗。新疆这支由各兄弟民族组成的干部队伍，经过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证明是能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能够团结各族人民胜利前进的。党的其他各项民族政策，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党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核心。而加强党的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团结的、坚持反修斗争的、有朝气的、联系群众的战斗堡垒，通过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去带动党的团结和各族人民的团结。



二十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在同危害团结的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中实现的。毛主席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是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根本不相容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一九五二年开展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又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进行了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每一次斗争，都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无产阶级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都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在斗争中，注意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把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前者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后者则是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是苏修的代理人。这样，就既能有力地打击顽固的敌人，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新疆地处祖国反修前哨。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不断对新疆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妄图变新疆为他们的殖民地。新疆的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则是苏修的走狗和内应。因此，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坚持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对敌斗争的大方向，深入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提高警惕，进一步加强团结，随时准备粉碎苏修颠覆、侵略的罪恶阴谋。过去，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今后，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苏修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进行颠覆、制造分裂，永远不可能得逞。

回顾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各族人民在欢庆节日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光荣历史责任，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民族团结，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好战备工作，使新疆成为祖国西北边疆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障碍，新疆各族人民将再接再厉，勇往直前，以更加坚韧、奋发的革命精神，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

——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

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工业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方针，江苏无锡县近年来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要不要办工业？怎样才能办好社队工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这个县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农村社队的任务是搞农业生产，工业应该让国家和城市去搞。还有的同志看到社队工业在发展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帮助它解决，而是持消极态度，不敢支持它。结果，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一直停滞不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无锡县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扩大“三熟”面积，迫切要求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县委认识到，单纯等待和依赖城市大工业的支援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了，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他们通过实践体会到，对于一个县来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业和社队工业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要持久地以较髙速度发展，又需要工业的支援。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就会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整个经济不断高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等指示，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力更生，积极发展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一九七四年，全县办起工厂一千六百三十八个，其中社办二百二十九个，队办一千二百七十四个，社社队队都有了自己的小工厂；工业总产值达到二亿六千九百多万元，其中社队工业占一半。在工业的支援下，农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六



十七斤。

实践表明，社队工业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

社队工业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提高了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充分显示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过去，这个县多数公社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生产水平比较低，公社、大队两级所有的经济比重很小。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公社、大队所有的固定资产，已占三级所有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五。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标志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深远的意义。社队工业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支援了穷队的农田基本建设，缩小了穷富队之间的差别；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大量的设备、资金，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材；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使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为主、农业机械购置以集体为主的方针逐步得到落实。例如，梅村等六个公社，社队工业一九七四年积累资金七百多万元。他们拿出三百多万元武装农业，支援穷队，为各大队和生产队添置农业机械、机床，修建地下渠道，开展农业科学实验，修盖猪舍等。有的队过去底子很薄，现在也有了车床、手扶拖拉机，盖了猪舍，经济力量逐步壮大。目前，全县已有农业机械动力二十一万马力，平均四亩地有一马力。拥有拖拉机二千九百多台，机耕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八的生产队通了电，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社队工业的发展，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农民战胜资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广大社员看到社队经济“一步一层楼”，感到集体有靠头，社会主义有奔头，就更加热爱社会主义。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得到初步普及，抗灾能力进一步提高，这本身就是对“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它有利于使农民更坚决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同时支持了农村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

发展社队工业，也加快了整个工业发展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贯彻落实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方针，必须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社队工业。社队工业具有



规模小、投资少、建设快的特点，能够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无锡县的经验证明，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同时办好县办工业，大大加快了工业的发展速度。只几年的时间，这个县每年已经能生产钢和钢材各一万吨，合成氨七千多吨，柴油机九千多台，手扶拖拉机三千多台，电动机二十二万瓩，水泥二万多吨，聚氯乙烯树脂近二千吨。

发展社队工业的根本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针。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社队工业同样存在着这种斗争。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的，产供销没有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受价值规律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发展社队工业中，办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售，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企业，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利润挂帅；是支农第一，还是赚钱第一。无锡县委在发展社队工业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经常向社队工业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端正企业的方向路线。同时，反复地宣传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正确认识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是我们党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措施，并且采取具体办法，保证把支援农业，坚持为农业服务，作为社队工业发展的重点。例如，在办厂次序的安排上，把支农厂放在首位，首先集中力量办好对支援农业有决定意义的工厂；在产品安排上，把支农产品放在首位；在生产安排上，把农机修配放在首位。

加强对社队工业的领导，把产供销不同程度地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使社队工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无锡县在县、社两级都成立了社队工业的管理机构，由县集中统一安排社队工业的产供销计划，逐步做到有些产品纳入县或省、地的计划，有些产品与大厂挂钩定点加工，有些产品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目前这个县的社队工业产供销已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以不同的形



式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的轨道。他们对一些原材料来源没有保证，销路又不稳定的产品，还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同时，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和银行的监督作用，从生产、交换等环节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保证社队工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社队工业不仅产品主要应为农业服务，积累也应该主要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服务。无锡县委在实践中体会到，社队工业积累不仅要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特别是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社队工业的积累不为农业服务，就可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产生盲目发展的倾向。他们总结了各社队使用社队工业积累的经验教训，规定社队工业的积累，百分之六十左右用于购置农业机械，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支援穷队改变面貌，百分之三十左右用于社队工业扩大再生产，百分之十左右用于文教、卫生等事业。严格禁止社队用工业积累搞楼堂馆所。这就使社队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越来越明确，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无锡县社队工业实行的是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评工记分的计酬方法，这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生事物。这个县的社队工业工人，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每年有三、四个月回队参加农业劳动，既保证了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又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他们规定亦工亦农人员，包括社队企业干部，都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收入归队，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对一些技术比较熟练的人员，给予必要的补贴，但补贴也不能过高。在劳保福利方面，除了必要的劳动保护外，其他都和社员一样，不搞两种制度、两样待遇。这样，既稳定了农村劳动力，又调动了亦工亦农人员的积极性，使广大社员关心工厂的发展，在工厂劳动的社员也关心农业生产、关心生产队的事，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社队工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无锡县委在社办企业建立了党支部，队办企业建立了党小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保证社队工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

现在，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广大职工，正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建设理论队伍 推动群众学习

天津市染料厂党委会

我厂工人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中建立起来的，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又进一步成长、壮大，目前理论队伍成员已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他们在党委会和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时，也积极带动和辅导职工群众进行学习，推动了我厂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现在全厂广大职工学理论，抓路线，讲团结，促生产，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工人理论队伍建立以后，我们始终注意抓好理论队伍的思想领导，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引导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在斗争中提高。开始，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理论基础差，“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思想上有自卑感，行动上畏缩不前；也有的同志抱着“行就干，不行就散”的试试看的态度。针对这种畏难情绪，党委会反复进行了思想工作，从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的高度，启发大家认清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鼓励他们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做一个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认识提高以后，压力变成了动力，在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理论队伍勇敢上阵，朝气蓬勃地前进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包含着矛盾的，理论队伍建设中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长期存在的。当理论队伍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以后，有的同志又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党委会和支部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工人理论队伍，如果不加以抵制，工人理论队伍就会走偏方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及时组织理论队伍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帮助他们认识：做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必须拒腐蚀，永不



沾，在参加生产劳动和现实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冲洗资产阶级的政治灰尘，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帮助理论队伍建立和健全生活会制度，使他们提高了改造思想的自觉性，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革命学习，为革命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正象有的工人说的：“打铁先得自身硬。”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有自己首先“搞清楚”，才能帮助职工群众学好。因此，我们不断加强对理论队伍的学习领导，要求他们发扬知难而进的革命精神，刻苦读书，努力钻研，学懂弄通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在原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同时，党委会又采取各种措施，想方设法使他们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我们围绕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和内容，经常举办理论队伍成员读书班，开办一些基本理论知识讲座，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除了要求他们同班组里的职工群众一起学习以外，每星期还给他们安排半天的学习研究时间。并且根据需求和可能，选派他们到上级机关举办的读书班去学习。此外，我们还强调理论队伍成员要在业余时间养成自学的好习惯，除了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学一点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更好地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还要读点反面教材，从正反两方面增强识别能力，提高战斗水平。目前，我们厂的理论队伍正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开展研究和评论。

对于工人理论队伍本身的学习，既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又要注意严格要求。我们认为，文化程度低一些，理论基础差一些，这都不要紧，由浅入深，从头学起就是了。但是，一定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这是理论队伍学习和提高的关键。我们强调要努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把所学的革命理论用来分析和解决本单位的方向、路线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各项工作搞上去，防止那种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错误倾向。这样抓了以后，理论队伍中出现了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的好风气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好学风。二车间理论小组为了弄懂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怎样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认真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等著作的有关章节，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认识到它们在基本适应的情况下，还有不相适应的方面。这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如不很好解决，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因此，必须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对这个问题基本弄清楚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车间存在的人与人关系方面的问题，帮助车间领导提高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认识，改进工作方法，从而增强了干群团结，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办了六期工人轮训班，引导工人群众增强当好企业主人的自觉性，使车间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气象。

工人理论队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基层和群众之中，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工人理论队伍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放在本单位，立足于班组，帮助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就要求理论队伍的成员充分利用自己生活在群众之中的有利条件，坚持与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为要当好先生，首先当好学生。如果认为自己身上沾过“油泥”，就不需要当好学生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论队伍虽来自群众，但也有一个继续和群众结合的问题；理论队伍成员虽是工人，但也有一个向工人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认识提高了，理论队伍的成员以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班组学习活跃起来。他们在同群众一起学习当中，也使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提高。

为了发挥工人理论队伍在群众学习中的带动作用，我们一直坚持了以下几种做法：

一、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工人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方面，理论队伍密切关心车间班组学习情况，把群众学习中遇到的难点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内容。三车间“三八”工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对于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争论热烈，有的同志总感到似懂非懂，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理论小组成员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的同时，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本单位的各种表现，然后经过综合分析，再向群众进行讲解。这就使群众对资产阶级法权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提高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自觉性，促进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班组学习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理论队伍开展专题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拿到群众中去讨论、



修改、提高。四车间理论小组研究苏联变修的原因，写出初稿后即主动征求群众的意见，随后又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修改，再交给群众讨论。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多次反复，稿子的质量就大大提高了。这种理论队伍和群众之间的互相促进，有助于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了弄清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关系，四车间理论小组与工人群众一起调查了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造成的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厂里搞“评工记分赛”，干什么活都记分，闹得工人不团结，涣散了人心，影响了生产。一些老工人气愤地说：“评奖评奖，越评越僵，越评越伤。”理论小组根据这些实际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分析了如果没有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起破坏作用，使领导和职工深受教育，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调动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大干快上。

三、坚持为班组学习服务，为群众学习服务。理论小组经常分析车间班组学习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搞好学习。他们还根据班组学习的进度和需要，有的放矢地进行集中和分散的辅导，用通俗的语言，结合生动的事例，对基本理论问题作比较明白透彻的讲解。群众反映：“这样的辅导针对性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我们欢迎。”除此以外，理论队伍还帮助群众总结学习经验，整理学习心得体会，组织交流和推广，对广大群众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些办法，较好地发挥了理论队伍在群众学习中的带头作用，使群众的学习扎扎实实、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工人同志称赞工人理论队伍说：他们是群众学习的骨干，基层领导的得力助手和好参谋。

工人理论队伍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历史虽然还不长，但已经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今后它在理论战线的斗争中必然要担当起更加繁重的任务。我们通过初步的回顾，提高了对工人理论队伍的性质、作用的认识，决心更加爱护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它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好理论队伍的关键。放任自流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一定要把建设理论队伍作为反修防修、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战略任务，经常不断地抓紧，抓好。



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毛主席及时地向我们指出了一系列政策问题，包括鼓励技术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和发挥他们积极作用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毛主席的这一政策，鼓舞了广大技术人员的前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沪东造船厂技术队伍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沪东造船厂目前担任技术工作的人员有七百七十五人，大多数是从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来的，从工人中选拔的技术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支技术人员队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从这个厂技术人员的状况看，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广大技术人员为革命而钻研技术，迫切要求为尽快地改变造船工业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厂的党委分析了技术人员的状况，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他们的政治思想表现、技术专长，对他们作了适当的安排：有百分之八十九的技术人员在厂部和车间技术部门工作，其他同志在班组边参加劳动、边帮助工人搞技术革新。原来下放劳动的技术人员，大多数都已安排使用。在安排技术人员的过程中，他们既注意防止把技术人员单纯作为劳动力使用，充分发挥各类技术人员的专长，又注意在使用中加强教育，在工作中提高他们。

技术人员的使用和改造，两者是一致的。只有在使用中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不断鼓励他们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才能既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又能使他们的世界观进一步得到改造。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技术人员的世界观问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对待技术知识的态度上。在开展技术工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很容易在部分技术人员中以各种形式反复表现出来，形成这种



或那种片面性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这个厂的党组织通过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技术人员摆正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积极鼓励他们抢挑重担,对于做出一定成绩的技术人员,及时地进行表扬。对同工人“**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创造发明**”的技术人员进行报导和鼓励。这一条很重要,这是调动技术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方法,也是体现党的政策的重要方面。而当工作上发生差错的时候,只要不是严重失职,就由领导主动承担责任,并教育干部和工人群众支持技术人员做好工作。有一次,厂领导分配原副总工程师负责设计厂里第一台一百吨高架吊车,这是制造万吨轮的一个关键设备。开始,有人批评说这是走“专家治厂”的老路,这个工程师也顾虑重重。后来,党委及时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清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和工人群众结合,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它和“专家治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同时,厂领导鼓励这个工程师虚心向群众学习,有事找群众商量,大胆负责,积极工作。并向他指出,只要主观上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设计的一百吨高架吊车制造出来后的起重能力只有六十吨、八十吨,也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工程师在得到鼓励与支持后,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同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精神振作,工作大胆负责,胜利地完成了设计任务。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技术工作岗位的工人技术人员,包括一部分刚从学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这个厂的党组织也坚持在生产实践中进行培养、提高。这些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说敢干,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但理论知识和技术工作经验不够。有人认为,既然工人技术人员缺少理论知识,那就应该关起门来学习、提高。这个厂的党组织回顾本厂文化大革命以前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沉痛教训,认识到按什么样的路线去培养工人技术人员,这是关系到工人阶级占领和改造技术阵地的大问题,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他们既强调工人技术人员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又注意有意识地让他们独当一面搞设计工作,以便得到较多的锻炼机会。同时,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原来的技术人员互帮互学,取长补短,举办“七·二一”大学、专业技术训练班,为工人技术人员进修技术理论提供各种条件。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工人技术人员成了技术骨干,有半数担任了各级技术领导工作。

技术人员要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就必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他们改造世界观、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这个厂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许多技术人员一进技术部门,往往是“一块绘图板,一张写字台”,闭门翻书查资料,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结果,不少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技术理论知识也



不能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下放科室人员**”的号召，上船台，下车间，和工人群众一起劳动，做到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块流，改变了过去那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状况，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焊接试验室有个青年技术员，进厂后闭门找数据、搞试验，不了解焊接生产的情况，工作了几年，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脱下蓝大褂，拿起电焊枪，和别的技术人员一起到车间劳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电焊工人用氩弧焊的老工艺焊接柴油机排气阀时，由于加工的部件要用两只大电炉预热，得冒着高温连续操作五、六十分钟，劳动条件很差。工人们看到技术人员下来劳动，高兴地说：“你们能不能和我们一起革掉高温的命？”工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正是焊接试验室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这个青年技术员和别的技术人员同工人在一起，边劳动，边研究，终于试制成功了等离子电焊机，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许多技术人员正是在参加生产劳动中，逐渐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找到了发挥技术理论知识的广阔天地，增强了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自觉性。

这几年，随着造船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人员从事产品设计、研究试制工作。技术人员回到了技术工作岗位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参加劳动？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开始有的技术人员思想上有顾虑，认为参加劳动在时间上得不偿失；也有的认为参加一段劳动以后“毕业”了，可以埋头于业务工作了。这个厂的党委，通过总结经验，反复帮助大家认识到：科学技术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技术人员头脑里固有的，只能来源于广大劳动群众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实践。技术人员只有坚持参加劳动，才能通过生产实践明确技术工作的努力方向和任务，使技术理论水平不断地得到充实、提高。现在，这个厂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已经坚持了五年，并且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形式。全厂技术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技术人员还掌握了一至二种操作技术。他们参加劳动并没有影响专业工作，相反地，实际完成的技术工作量还比以前成倍地增长。如造船技术组，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人员没有增加，实际完成的设计任务却增加了七、八倍。

技术人员坚持参加劳动，改善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为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发挥技术专长，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有的同志曾担心，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钻研技术，妨碍技术工作的开展？沪东造船厂的经验证明，技术人员



坚持参加劳动，经常深入现场，同工人群众结合，有利于推动技术工作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技术人员掌握的理论知识，是总结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而得来的。生产技术在不断发展，技术理论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生产技术飞跃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坚持参加劳动，就会脱离实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近两年，这个厂试制一种新型大马力柴油机，在试车时发现曲轴表面有小麻点的“穴蚀”。开始，技术人员关门查阅外国资料，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后来，他们通过参加劳动，广泛征求工人的意见。工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各方面寻找原因，提出改进方案，把工人的生产实践经验同技术人员的技术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终于在设备制造和工艺上作了改革，解决了这个技术关键问题。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双方都提高了技术水平。

技术领域过去一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的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选拔优秀的工人充实技术队伍，使这种情况起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技术领域里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依然激烈地存在着。为了走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造船工业的道路，这个厂的党组织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结合工厂实际，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在批判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掌握政策界限，注意做到：第一，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启发和引导技术人员自觉地联系思想实际，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第二，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批判，进一步加强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相互团结；第三，划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界限，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要批判崇洋迷外思想，又要洋为中用，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学习与研究外国的先进技术；既要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又要提倡技术人员为革命钻研技术，坚持又红又专，等等。这个厂通过抓紧上层建筑领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技术人员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为发展造船工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沪东造船厂党组织在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对于造就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队伍的战略目标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近，这个厂的党组织通过学理论，进一步总结经验，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成绩，改正缺点，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九六八年指示的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调查组



评论《水浒》反修防修

评投降派宋江

安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



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切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



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谰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



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



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投降有理，真是反动已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助于国”，这是他要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



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所谓的“忠义”，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是“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和起义农民长期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是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家“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他们的反抗精神，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起义军引上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要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四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的投降主义总倾向是通过歌颂投降派宋江来表现的。因此，揭露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对于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极为重要。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串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一部《水浒》，对宋江竭尽美化之能事：无耻的叛徒被颂扬为梁山的“恩主”；皇帝的奴才被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写成了上



符“天意”、下合“人心”的正确路线；受招安的丑剧被夸耀为梁山革命根据地的盛大节日。《水浒》通篇到底，对宋江及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全是歌颂，没有批判。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象《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的歌颂；象《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意投降的吴用自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三阮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还是在成书以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三十六人内都有晁盖。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列宋江于一百〇八人之首，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胡适从一九二〇年起写了几篇关于《水浒》的文章。他站在帝国主义奴才的立场上，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论的实用主义方法，歌颂宋江是“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在当前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必要结合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肃清其流毒。

《水浒》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

明朝末年，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影响极坏，流毒深远，贻害至今。

崇祯十四年左右，金圣叹伪称得到了早已失传的施耐庵的七十回《水浒》古本。实际上，他是把当时流行的百回本拦腰斩断，砍掉七十一回以后的“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删去原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加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本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提倡，从此就压倒其它版本，广泛地流传开来。

“腰斩”起了恶劣的作用，对此，鲁迅非常不满意。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金圣叹恰恰把这部反面教材写投降全过程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内容都砍掉了。

从他砍掉的二十多回中，我们可以看到，投降派如何利用篡夺到手的领导权，施展阴谋手段，把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了革命队伍，造成革命的失败。菊花会上那场斗争，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交锋。投降派宋江利用革命派笃信义气等弱点，采取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反革命手法，击败了革命派，强行通过了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就不择手段地向宋王朝献媚、请赦、投降。宋江为此窜进东京，钻营门路，不惜重金行贿，巴结皇帝宠妓李师师，拉拢朝廷重臣宿元景，双管齐下，打开了通向宋徽宗的门路，终于做成交易，叛变成功；然后充当宋王朝鹰犬，去打方腊。就这样，宋江这个可耻的带头羊，把起义农民领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屠场，完全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①宋江就是一条大蛀虫。金圣叹砍掉这些内容，对蛀虫的危害性，就不容易认识清楚了；此外，还砍掉李逵扯诏，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等违抗宋江旨意杀掉被俘朝廷将领等情节，掩盖了革命派反对投降的斗争精神。

在留下的七十回中，金圣叹也做了许多恶意的删改。原书中指责贪官的文



字，他都做了仔细的推敲。凡被认为“过火”，象“涂炭万姓”^②一类有可能祸及朝廷的字句，以及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③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第四十四回戴宗说：“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他也觉得不妥，改为“朝廷闭塞”，“奸臣不明”。这样不但更加强了《水浒》原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倾向，极力替皇帝开脱，而且也为贪官减罪。对起义农民的诬蔑，金圣叹总嫌施耐庵还不够狠。如把张横唱的“不怕官司不怕天”，改为“不爱交游只爱钱”^④；让吴用说出什么“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⑤。六十回写晁盖率军去打曾头市，宋江两次“苦劝”，一次“恐吓”，阻止晁盖去亲自指挥。宋江一贯架空晁盖，篡夺指挥权。晁盖发觉大权旁落，想通过曾头市一战，夺回指挥权。而金圣叹把“苦劝”、“恐吓”等内容也删掉了。

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便成了“断尾巴蜻蜓”，使人民认不清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如何在革命队伍内部得势、膨胀，直到完全葬送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认不清投降派背叛革命、充当奴才的丑恶嘴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砍掉了，不真实，使《水浒》不能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那么，金圣叹究竟为什么腰斩《水浒》，其反动目的何在？这需要分析金圣叹的思想立场，也要弄清是怎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金圣叹干起了腰斩《水浒》的勾当。

金圣叹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受到封建儒家思想教育，醉心科举，却屡试不第，一直未能捞到官做。他虽然生在明清之际，但对明清两代的封建主子，都极表恭顺。清顺治皇帝曾表示欣赏他的文笔，他得知后感激涕零，“叩首敬赋”，说什么“忽承皇帝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⑥，活现出一副令人恶心的奴才相。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他因“抗粮哭庙案”，被清政府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头。其实，金圣叹这样满脑袋孔学秕糠的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会“谋反”呢？鲁迅曾把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比做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与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只不过金圣叹的运气更糟糕，“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⑦。

金圣叹的思想是非常反动的。他是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狂热吹捧孔老二这个反动家伙在世时“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⑧；他美化“六经”，说靠了这些儒家的“圣经”，封建统治者的江山才能代代相传。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明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冲击下土崩瓦解、朝不保夕之际，金圣叹痛心疾首，力图挽救。可见，金圣叹的出身、教养、思想，决定了他极端仇视农民起义。

明朝末年，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全



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其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两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纵横南北，所向披靡。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当时，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采取所谓“剿逆抚顺”^⑨这一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主抚派搞政治欺骗，妄图收买、分化、瓦解起义队伍。但是起义农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明王朝的招安阴谋。崇祯年间，许多有名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右侍郎陈奇瑜、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等，就都因主抚失败，被明王朝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一情势，对金圣叹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从明王朝招安政策的不断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激烈地反对招安，通过评论《水浒》，疯狂地鼓吹军事镇压。他所以选中《水浒》，是因为这部作品流传广泛，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反对农民起义，在基本立场上同金圣叹一致。而它宣扬的主抚政策，金圣叹则认为效果不佳，又必须设法消除。这就是金圣叹之所以篡改、腰斩《水浒》的原因所在。

金圣叹通过评点、篡改、腰斩《水浒》，宣扬了哪些反动观点呢？

首先，金圣叹对农民起义进行恶毒咒骂和无耻诽谤。他大骂起义农民是“寇”，是“祸连朝廷”的“群丑”^⑩，是“天下之凶物”^⑪。他借评论梁山头领绰号为由，歪曲诬蔑，大放厥词。林冲绰号“豹子头”，他便说：“则知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⑫；李逵绰号“黑旋风”，他便说：“旋恶物聚于一处”^⑬，并说李逵入水泊，日月无光，故谓之“黑”。他攻击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是“杀人夺货”，“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在他这个地主老爷眼里，农民只有俯首帖耳当奴隶，老老实实受宰割，如若反抗，定要杀掉，所以他在批语中叫嚣“造反者族”^⑭。本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造反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金圣叹却颠倒黑白，说起义者从小“皆豺狼虎豹之姿”^⑮，长大了又“父兄失教，喜学拳勇”，“不事生产”，“不免困剧”，“试为劫夺”，“遂成啸聚”^⑯。这种奇谈怪论掩盖了地主阶级的血腥罪行，抹煞了阶级矛盾，把农民起义者诬蔑为天生坏种，充分暴露了金圣叹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者。

其次，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竭力维护；对孔孟之道喋喋不休，拼命鼓吹。他认为皇帝是“圣人”，是“天子”，只有皇帝才“有位”、“有德”，一切都必须对皇帝无条件地尽忠，不准有半点异心。为此，他在批语中拼命鼓吹孔孟之道的忠孝观念：“忠者，事上之盛节”，“与人之道”^⑰，“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⑱，它们是“量万物之斗斛”，“裁世界之刀尺”^⑲，“推而放之四海而准”^⑳。在农民起义烽火燃烧之际，金圣叹大谈忠孝，把儒家这些反动思想吹捧为天经地义、万古长存的真理，就是要用孔孟之道麻醉人民，瓦解人民的斗志，



维护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其反动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金圣叹对《水浒》中反贪官的描写说过几句好话，对贪官有过一些责骂，但这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无非是担心贪官们胡搞下去，会把皇帝的政权搞垮，如此而已。如果在这里给金圣叹涂脂抹粉，那就不仅仅是昏庸的问题了。

其三，金圣叹通过篡改、腰斩《水浒》，狂热鼓吹“斩尽杀绝”论。他攻击主张招安的人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使“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他不相信“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的如意算盘，认为结果会适得其反，“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④金圣叹与《水浒》作者施耐庵，虽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都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他对施耐庵还不无溢美之词，但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施耐庵是个主抚派，他的一部《水浒》就是歌颂招安，宣扬投降的。金圣叹则认为招安宋江这样的“盗魁”，并给官做，实在危险极了。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把《水浒》原书七十一回以后的二十多回砍掉，造谣说这些回目不是施耐庵原书所有，一口咬定是罗贯中“横添狗尾”^⑤，借以掩盖他和施耐庵的分歧，以便把施耐庵歌颂招安的《水浒》改造成一部要杀尽起义农民的书。他捏造出一个天神嵇叔夜，在卢俊义的梦境中把梁山一百〇八名头领统统杀掉，实际上只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既愚蠢又可怜。他乞求的天神嵇叔夜，不过是没落阶级心造的幻影；他迷信的屠杀政策，也和招抚政策同样无用。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后的第三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上了。革命的农民起义横扫了贪官和皇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金圣叹之流的反动派。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地主资产阶级十分赞赏。他们竭力吹嘘金批本《水浒》“深得剪裁之妙”^⑥，有“开拓万世”^⑦之功，竟使造反的农民“不寒而栗”，从此“畏罪不敢为非”^⑧，等等。其中，洋奴文人胡适，吹捧得最起劲。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和一九二一年六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考证》和《〈水浒传〉后考》两篇长文。胡适为什么花这么大心血干这件事，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历史癖”和“考据癖”^⑨。

事情真的象胡适说的那样吗？否！

什么“历史癖”、“考据癖”，拆穿了说，就是“反革命癖”。胡适的两篇毒草出笼时，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混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实在忍不住了”，抛掉了“新文化战士”的伪装，大叫“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⑩，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一头扎到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中，表示忏悔，说什么“小人无罪”，“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光荣’”^②，并供认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是“逼上梁山”^③。原来他和宋江一样，也是一个投降派。

胡适用唯心主义来考证《水浒》，其目的是在于破坏革命运动的深入，把青年领到邪路上去。他自诩要教给青年人“一点防身的本领”，“教人一个不受人感的方法”。要防什么呢？他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④一语泄露了他的反革命天机，原来他搞烦琐考证，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确有一些青年受了胡适的毒害，埋头读书研究，掉在烦琐考证的迷宫里，不关心祖国的命运，脱离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政府用警棍、水龙、洋枪办不到的，胡适这个投降派在某些青年身上办到了，难怪军阀们那样宠爱这个现代的宋江。胡适在文章中谈杀尽强盗，天下太平，这实际上是为军阀政府出谋画策，制造舆论，以便绞杀革命。所以，胡适关于《水浒》的考证，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

胡适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吹捧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⑤。这是奴才赞奴才，小丑捧小丑。胡适吹捧金圣叹，是因为他们思想相同，感情相同，立场相同。他们都仇视人民革命，都面临革命风暴的冲击，都妄图作垂死挣扎，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遭际有相同处”^⑥。胡适吹捧金圣叹，还因为他要借用金圣叹的旗号，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他战战兢兢请出金圣叹的亡灵，借助它来挽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失败命运。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胡适的痴心妄想，同金圣叹当年呼唤天神嵇叔夜一样，都是一枕黄粱，无法实现的。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胡适赞不绝口，并为金圣叹圆谎，硬说他确有《水浒》古本。他吹捧金批本是什么“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⑦。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胡适能给予这么高评价的恐怕只有这本“奇书”了。谁都知道，在胡适这个洋奴眼里，中国无论什么都不如洋大人的好。他对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一向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为什么唯独对金批本《水浒》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呢？奥妙在于，他要利用这部作品干反革命勾当。胡适不是标榜自己是实用主义信徒吗？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有用即真理”，也就是说，凡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有用”，就是“真理”。胡适觉得金批本《水浒》对他们有用，他就舞文弄墨，胡吹乱捧。实际上，他捧金批本《水浒》，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人们相信他从中挾发的反动思想，就是：强盗“格外反抗政府”，“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⑧，“强盗灭绝之



后天下方得太平”^⑤。显然，他这里说的“强盗”就是影射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他所要的“天下太平”就是要镇压革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胡适比金圣叹跑得更远，他不但背叛了新文化运动，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投降，而且要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是个无耻的民族投降派。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在五十年代曾对胡适的反动思想，做过深刻的批判，但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胡适的流毒未能彻底肃清。特别是在《水浒》的评论和出版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一些人拾胡适的余唾，继续吹捧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说什么金批本是“很好的节本”，“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曾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这些言论都同鲁迅的论述唱反调，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使人们认不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都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今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金圣叹和胡适的反动思想，肃清他们的流毒，还《水浒》以本来面目，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注：

- | | |
|--|--|
| <p>① 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鲁迅书信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p> <p>② 《水浒全传》第六十三回，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p> <p>③ 《水浒全传》第十六回</p> <p>④ 金批本《水浒》第三十六回</p> <p>⑤ 金批本《水浒》第六十七回</p> <p>⑥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p> <p>⑦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p> <p>⑧ 金批本《水浒》序一</p> <p>⑨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p> <p>⑩ 金批本《水浒》第十七回总批</p> <p>⑪⑮⑰ 金批本《水浒》序二</p> <p>⑫ 金批本《水浒》第十四回夹批</p> | <p>⑬ 金批本《水浒》第十回总批</p> <p>⑭⑱ 金批本《水浒》《宋史目》</p> <p>⑯ 金批本《水浒》第五十七回总批</p> <p>⑰⑲ 金批本《水浒》第四十一回总批</p> <p>⑳ 金批本《水浒》序三</p> <p>㉑ 金批本《水浒》第七十回总批</p> <p>㉒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p> <p>㉓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p> <p>㉔ 王望如：《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p> <p>㉕⑳㉑㉒㉓ 胡适：《水浒传考证》</p> <p>㉔ 胡适：《我的歧路》</p> <p>㉕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p> <p>㉖ 胡适：《逼上梁山》</p> <p>㉗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p> <p>㉘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p> |
|--|--|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 荣 国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和宋江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真面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重大斗争，它对于澄清过去多年来在评论《水浒》中的错误观点，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现实的意义。我想结合宋代农民战争史实，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指示的一点体会。

反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试金石。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专政的国家机器。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封建王朝的。《水浒》里的李逵，曾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正是一种起义农民对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但是，在《水浒》全书中，李逵反皇帝的革命精神是被否定的，宣扬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写成农民起义的主导思想，完全歪曲了北宋时期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

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到宋代大大加强，皇帝在封建国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剥削者。北宋历代皇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拚命掠夺的反动政策，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一系列反对皇帝、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喊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坚决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他们还建号称王，署置官吏，建立起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革命政权，表明了打倒宋朝皇帝、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到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农民和皇帝的矛盾更加尖锐。赵佶设立了后苑作、营缮所、西城所等机构，指使杨戩、李彦等封建官吏替他大量“括民田”，进行赤裸裸的土地掠夺；又在长江下游富庶地区搜括奇



花、异石等珍贵物品，用船运往京城玩赏。受尽苦难的农民以坚决的武装起义来回答皇帝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和宋江同时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对群众愤怒控诉了宋朝皇帝的内外政策，指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他还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即起义军将于十年内推翻宋王朝，统一全国的估计。这是起义农民决心砸碎封建国家机器的大胆宣言，洋溢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壮志。这些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农民与封建王朝是势不两立的。《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安到革命农民头上，是对农民起义的恶毒诬蔑。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的。历史上，每当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些皇帝往往也发出“反贪官”的叫喊，假惺惺地表示要“澄清吏治”，企图欺骗农民，借以达到转移革命锋芒，瓦解起义队伍的罪恶目的。例如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宋太宗赵匡义就虚伪地对起义农民表示，“汝曹本非为恶，但官吏失于抚御，致尔为盗”（《宋朝事实》卷十七），还说什么“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挠我蒸民，起为狂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赵匡义把自己打扮为一心爱民，只是偶然失察用了几个“贪官”的“好皇帝”，而把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责完全推在几个官吏身上，想以此欺骗农民。《水浒》里反复鼓吹徽宗“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还借宋江之口咒骂农民起义是“罪恶迷天”，这和赵匡义唱的是同一个调子。《水浒》作者生当元朝末年，那时也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水浒》作者竭力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目的正在于散播对皇帝和“清官”的幻想，麻痹起义农民的革命意志，取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完全是从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

《水浒》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竭力回避农民和皇帝的矛盾，这也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梁山农民起义明明是对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官有、勒令渔民“立租算船纳直”的武装反抗，《水浒》对此却一字不提，也丝毫没有提到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宣和遗事》里梁山三十六人中有十二人与花石纲有关，但因为花石纲是赵佶直接施行的暴政而被《水浒》作者大加删略。另一方面，《水浒》却处处把宋江同高俅放在对立面来写，着重渲染这两个人的矛盾和斗争，甚至还把高俅等称为“元凶首恶”，列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其实，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企图通过突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来把宋江装扮为起义农



民的英雄,掩盖宋江的投降派实质。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起义农民的死对头,都是真正的元凶首恶赵佶的忠实走狗。在维护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上,宋江和高俅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宋江混入了农民起义队伍,披着革命者的伪装来干反革命的勾当,这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能起到高俅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队伍内部都曾出现过投降和反投降的激烈的路线斗争。这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封建统治者使用残酷的武装镇压和阴险的政治欺骗(包括招安)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这是起义队伍内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外部原因;而起义队伍内混进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或是产生了被地主阶级腐蚀拉拢而蜕化的变节分子,则是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内部原因。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农民战争中,只有革命派坚持起义路线,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革命才能够得到发展和胜利。如果让投降派篡夺了起义领导权,就会使起义归于夭折。这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也可以得到证明。方腊于公元一一二〇年(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起义,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席卷江南地区六州五十二县,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和“横行齐魏”的梁山起义军形成了联合夹击北宋王朝的有利形势。革命的迅速发展正是方腊坚持起义路线,提出推翻北宋王朝的明确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的成果。同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中梁山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本来形势很好,却因投降派宋江窃踞领袖地位,搞修正主义,结果向赵佶屈膝投降,随后就去打方腊。因而起义军全军迅速归于毁灭,宋江也落得个“兔死狗烹”、饮鸩而亡的可耻下场。梁山起义军失败的这个惨痛教训,是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的。

《水浒》作者把投降派宋江美化为英雄,为他安排了“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的理想结局,就是想劝诱革命人民都去当宋江,走奴才的道路。《水浒》对“托胆称王”、“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晁盖却是另一种态度,让他“归天及早”,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借以反衬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宋江和晁盖是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阶级的不同路线;晁盖是起义农民的领袖,他的“聚义”是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坚持了农民起义的路线。

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还对梁山起义军中反投降派的形象进行恶毒的丑化,把李逵、三阮这些反投降的英雄,写成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宋江的错误领导。



历史上有过许多对投降派进行斗争的农民革命英雄。例如，唐末农民起义中的黄巢，他当众怒斥另一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准备接受唐王朝招安的无耻叛卖行径，毅然和王仙芝决裂，率领起义军主力转战南北，使革命继续取得重大胜利。南宋初年，在洞庭湖地区起义的杨么，他多次坚决拒绝宋王朝和伪齐刘豫政权的诱降；当起义军中有一些人动摇变节时，杨么坚决顶住投降妖风，英勇抵抗，被俘后慷慨就义。这些坚决反对投降的英雄，代表了我国农民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显示了“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英雄气概。为什么《水浒》的作者抛开千百次农民起义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不写，却偏偏把投降派宋江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美化为起义农民的英雄，企图把革命农民引上宋江的道路？这不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明显证据吗？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所以农民战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决不等于投降。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是同封建统治者奋战到底的，宋代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就都坚持到最后。和宋江同时的方腊，横眉冷对赵佶的“招抚”骗局，领导起义军数万人坚守帮源洞根据地，英勇战斗，最后壮烈牺牲，以热血谱写了英雄的乐章，这怎么能象有些人所说的投降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革命农民坚决反对投降，既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也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杨么、方腊都是典型的例子。方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不但是对封建剥削而且也是对宋王朝将人民的膏血奉献给辽、夏统治者的罪恶行径的愤怒控诉。这是革命农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表现。修正主义者出于对革命人民伟大力量的畏惧，拼命诬蔑农民，抹杀农民的革命性。林彪诬蔑农民只会耕田种地，只懂油盐柴米；苏修御用学者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农民革命，他们和《水浒》的作者正是一丘之貉。

我们评论《水浒》，要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对照起来研究，通过分析古代投降派宋江来更好地看清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反复学习和深入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战斗，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

我们大队居住在梁山脚下。梁山周围，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湖泊。传说《水浒》中的梁山泊，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们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但是，被有的人称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却根本没有正确地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最近，毛主席深刻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俺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水浒》这部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水浒》竭力歌颂投降派，宣扬阶级投降主义，这是对农民起义光辉历史的肆意篡改，是对农民革命战争的极大歪曲。

翻开《水浒》就可以看到，上梁山的许多人，不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做生意折了本，就是因为想做官，弄个“封妻荫子”，很大一部分则是为了报个人恩怨上山的。这种描写，完全是从地主阶级的需要出发，它掩盖了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的真正原因。

农民究竟为什么要举行起义和斗争，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原因的。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包括梁山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在旧社会，梁山地区的人民群众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宋末年，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公田”，规定群众下湖采莲捕鱼都要缴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逐步衰落，它们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连养鸡、走路、过河坐船、小孩出生，都要纳捐纳税，人们叫做“百样捐”，其实哪止一百样！到清代末年，这里种一亩地，连租带税就要纳九吊钱，合九十斤小麦，而当时一亩地只不过收六、七十斤，还不够缴租税的。“东平州，十年九不收。”遇到灾年，景况就更惨了！光绪年间，我们这里遭了一场大水，官府各种捐税按例照收，分文



不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农夫苦，农夫苦，胥吏催租，收成不足无钱付，只得咬牙切齿，售儿卖女。”那时我们村六百多口人，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十多人，很多人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就说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完全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下逼出来的，而决不是因为什么“输了钱”，“折了本”。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造成的。我们知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把农民同地主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归结为个人恩怨，这是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

抱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的卑鄙目的上山入伙的人是有的，例如《水浒》中的宋江一类就是这种人物。他们或者是地主豪绅，或者是朝廷命官，或者是落第秀才，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确实是根本一致的。这种人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这种人和高俅之流的矛盾，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他们上山入伙根本不是要搞什么农民起义。

《水浒》把宋江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捧上了天，把“替天行道”，即为封建皇帝效劳，当做农民起义军的宗旨，这也是完全违反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事实的。我们梁山地区农民革命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明代末年，在这一带就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群众明确地提出“要不穷，杀朝廷”、“均贫富，不受苦”的口号，作为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不仅起义军反对皇帝，就是那些没有参加起义军的贫苦农民，也对腐朽的封建皇帝怀有深仇大恨。捻军和黑旗军转战到这里时，梁山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起义队伍，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王朝的精锐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当时，这里有一首歌谣说：“老爷生在芦花滩，不怕皇帝不怕官。”这首歌谣表达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斗争精神。据记载，仅在清代咸丰年间，梁山一带就发生了满光印、席万林、董增奇等领导的农民暴动，重创了反动军队，击毙清军副都统舒明安等，打击了封建统治。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最大的地主。在皇帝的卵翼下，地主阶级的官僚无官不贪，他们都是执行皇帝的意旨来镇压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既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末农民革命就决不仅仅反对一部分官僚，而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皇帝，指向整个地主阶级。正是“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象《水浒》所歪曲的那样，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



反皇帝，那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岂不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皇帝统治地位的帮手吗？这种谬论，早就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农民革命口号和历史上一个个反动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倒台的事实彻底粉碎了。

《水浒》把接受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也是对农民革命的极大歪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任何想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调和起来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过去，梁山这个地方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者一再惊呼“梁山泺，素多盗”，是一个“久反之地”。地主阶级和封建皇帝从来都把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恨不能一下子斩尽杀绝。北宋末年，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梁山起义者，据他们供认，所杀“不可胜计”。清王朝在梁山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梁山营”，派来重兵把守。这个“梁山营”就安在我们后集村。但是，地主阶级的武装镇压，只能激起农民阶级的更大反抗。擒军起义时，有个农民军英雄叫胡四，他领着起义军在梁山一带屡次打败清兵的进攻。后来战败被俘，反动派用零刀碎剮来威胁他，但他并没有向敌人低头，最后壮烈牺牲。胡四等人的英雄事迹充分证明，招安决不是真正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

招安政策是地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一种反动政策，是武装镇压的补充手段。《水浒》中的宋江接受招安，大搞投降，围剿别的农民起义军，充当地主阶级的鹰犬，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内奸和叛徒。他的可耻下场，同农民革命军英勇悲壮、前赴后继的斗争，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它是不可能向地主阶级投降的。有人把《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是对农民革命的诬蔑。斗争不屈而失败，同为了升官发财而屈膝投降，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混为一谈。《水浒》把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归宿，宣扬革命无理，投降光荣，其目的是要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放下斗争武器，忍受剥削阶级的宰割。这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梦想！

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失败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路线，才能领导和指引我们劳动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梁山人民特别感到幸福。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



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总是要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分析能力，善于识别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者，识别阶级投降派和民族投降派。在帮助人们识别什么是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方面，《水浒》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它，通过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揭露古代的投降派宋江和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

《水浒》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回里，用“石碣天文”公布梁山头领一百〇八人的名单。在这张名单上，晁盖这个梁山革命事业创建者的名字被一笔勾销了。

关于这一点，能不能用晁盖牺牲在前、名单公布在后的理由来解释？不能。拿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来说，尽管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早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就已牺牲，但在太平天国后来公布的“朝天朝主图”上，仍然有冯云山和肖朝贵的位置，以表示对牺牲了的领袖尊崇和怀念。在《水浒》故事的前身——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里，尽管晁盖后来是牺牲了，但它借“天文”所公布的梁山英雄名单（当时是三十六人）里，也有晁盖的名字。《水浒》却完全相反，不仅在七十一回的“石碣天文”公布的名单里把晁盖屏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而且在《水浒》的最后一回里作了这样的精心安排：宋徽宗“亲书圣旨”，令济州为宋江建“靖忠之庙”，庙内“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至于晁盖，则一笔勾销了，作者与皇帝都认为他没资格享受“万年香火”。由此可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乃是作者贯穿全书的意图。



《水浒》为什么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作者在第七十一回里给我们交了底：“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托胆称王”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向整个封建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挑战。既然“托胆称王”，那就必然要建立与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用朱贵的话来说，就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用李逵的话来说，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的“托胆称王”反映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意志和愿望，为此，《水浒》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要恶毒地让他“归天及早”，以便使宋江及早“把寨为头”。

宋江的“呼群保义”与晁盖恰正相反。他的“呼群”，是在梁山上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为日后投降受招安作准备。他的“保义”，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心要做忠于封建王朝的奴才。因此，晁盖的“托胆称王”与宋江的“呼群保义”分别代表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者是一条坚持斗争的革命路线，后者是一条鼓吹招安的投降路线。

宋江这个阴险的两面派，很善于伪装自己。他在晁盖在世时，“哥哥”、“晁天王”叫不离口；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处处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在梁山农民军内部组织了一个由反动军官、大地主结成的投降集团。晁盖一死，他立即全面地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旗号。但狡猾的宋江这时在忠义堂上仍然供起了“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的灵牌，用两面派的行径来骗取拥护晁盖革命路线的头领们的信任。这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当革命领袖逝世后，反动阶级就“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一旦投降成功，宋江也就公开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仅“尽行拆毁”梁山根据地的城垣房屋，连晁盖的灵牌也被他一把火“焚化”掉了。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在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有着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的真实用意，识破宋江之流的两面派面目。这对于我们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别革命派与投降派，是很有益处的。



思想评论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石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说明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干部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重要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对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又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现在，许多领导班子的成员，特别是第一、二把手，带头学习理论，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联系实际解决矛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地区、单位的领导班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顾大局，讲党性，团结战斗，发挥了自己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对领导班子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因此，各级领导班子应当把加强自身的建设作为一项经常的工作，注意抓紧抓好。

各级领导班子是党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各级指挥部。我们党正是依靠着各级领导班子把党的政治路线与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具体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并对广大群众进行恰当的组织和有利的领导，使党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和持久的发挥。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



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要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受到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没有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善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正确意见，克服群众中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也是很困难的。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不断深入发展，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加强，无论是在上层建筑还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无论是在调整生产关系还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斗争复杂，任务艰巨。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联系群众，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能落实党的政策，能识别和顶住错误的东西，哪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搞得扎扎实实，步步深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蓬勃发展。相反，如果领导班子不能这样办，革命和生产就必然处于后进状态。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各级领导班子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指挥部。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党的建设所进行的科学总结，对于我们领导班子的建设，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纲，把领导班子的路线搞端正。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是对全党的要求，而首先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要求。这三项原则中，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各级领导班子是不是能有力地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向资本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并取得胜利，不断前进，决定于它是不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应当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

各级领导班子要在自己所在的地区、部门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必须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团结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毛主席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曾经批评那种“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的现象，并指出“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毛主席的教导，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要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利益，不断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使“一班人”拧成一股绳，做到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一致，以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去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真正做到实质上的一致，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过集体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做出明确决定；而一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情，就应当贯彻执行，决不允许会上一套，会后一套。领导成员间如果有意见分歧，应当摆到桌面上来，使矛盾得到充分的暴露，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讨论，肯定和发扬正确的东西，澄清和克服错误的东西，以消除相互间的隔阂。作为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应当做到不但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样，领导班子内部才会有实质上的一致，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团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地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这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考虑，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长期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锻炼，有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很多老干部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教育青年干部，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很多青年干部虚心学习，把老一代的好经验、好作风接过来，努力接好革命的班。同时，青年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热情、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也使老干部受到很大鼓舞，促使他们更好地为党为



人民工作。总之，由于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发展了革命的同志关系，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党的团结，大大提高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三结合的原则，做到无论老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都能**“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很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对于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说：**“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这对于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经常都在对人们起着腐蚀、侵袭作用。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我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优越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要紧紧地同群众联系在一起，**“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细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把它看作是反修防修的一件大事。这样的领导班子，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领导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打硬仗。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滋长了骄气、暮气、官气、奢气和惰气，欣赏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如毛主席所批评的**“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就必然脱离群众，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甚至会蜕化变质。因此，我们应当把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放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开展以来，很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认真学习理论，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使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



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巴 山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走过了二十六年的战斗历程。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团结战斗的革命豪情，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个光辉节日。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到处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大好形势激励着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同时又对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总结经验，乘胜前进，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长期坚持下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正在进行的工作。这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学理论、讲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的，它又是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斗争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我们一定要把安定团结提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认识它的重大意义，自觉地为促进安定团结而斗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已经为无数事实所一再证明。有些地区和单位之所以一度不够安定团结，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懂得了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进一步理解了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并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现象作斗争，很快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把革命和生产推向前进。可见，实现安定团结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作指导；理论学得深，路线分得清，安定团结才能搞得更好。为了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搞好安定团结，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善于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造成一个人人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强大的革命声势。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不能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安定团结，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只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交给群众，就会变成促进安定团结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的正气就会上升，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下降，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必然陷于孤立，他们的破坏活动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安定团结才是可靠的，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各级党委是领导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指挥部。领导班子的路线是否端正、本身是否团结，这是能否实现安定团结的重要关键。有了敢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就能领导群众为促进安定团结而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多数的领导班子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党的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灰尘，必然会侵蚀到领导班子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同时要着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革命团结。对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对于在工作中大胆负责，努力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同志，上级领导机关应当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敢于大胆放手地工作，也可能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上级领导机关有责任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常胜将军。我们党打了几十



年仗，有一条经验，就是打了胜仗要多敲警钟，防止骄傲自满，打了败仗不要责怪下面，领导要承担责任。这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促进安定团结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安定团结，而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要制造混乱，挑拨离间，造谣诬蔑，以便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我们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人民内部也会发生某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例如，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等，就是危害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正因为如此，进一步实现安定团结，就要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促进安定团结必须坚持的根本政策。凡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提倡以大局为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增强革命团结。对于犯错误的人，要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我们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为了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各级领导机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十分重要。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总结和推广促进安定团结的好经验，克服影响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解决问题，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加强党群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努力造成毛主席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用什么标准要求学生？

上海市本溪中学党支部

今年六月三日，我校七六届八班的学生孔宪凤，在学农期间，为了抢救落水的同学，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象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小将，生前却没有被吸收参加红卫兵组织。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几个月来，我们围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培养教育学生这个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论述，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偏见，使学习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广大师生焕发了革命干劲，增强了革命团结，思想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究竟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来培养学生，还是用“五分加绵羊”的标准去要求学生，这是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次孔宪凤为抢救战友而牺牲自己，使许多同志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但是，也还有人认为，小孔生前“表现一般”，“不怎么样”。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反映了看待学生有不同的标准。

孔宪凤究竟是“好得很”还是“不怎么样”？通过讨论，认识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要使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孔宪凤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优秀青年。她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决心冲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束缚，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立志到大西北去放马；她为革命勤奋学习文化知识；她敢于对错误的东西开展批判、斗争；她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这样的青年，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一代的优秀代表之一。

那么，对小孔这样一个优秀青年，为什么会有“不怎么样”的看法呢？讨论中，小孔班级的班主任忻老师举了小孔生前两件事情，使大家很受启发。今年初，小孔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背诵毛主席的诗篇《送瘟神》。她背了几遍，感到没有把诗中的感情表达出来，还要继续背，但忻老师以为小孔是为了分数，就对她说：“你已经背了好几遍了，不要再背了，我给你记个‘良’，你该满意了吧！”小孔却回答：“我不是为了分数。”今年五月，小孔那个班级下乡学



农，她主动要求担任先遣队和炊事班的工作，而忻老师却认为小孔有私心杂念，想“出风头”。小孔不接受这种错误看法，他就觉得小孔“不听话”。可见，所谓“不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偏见在我们教师头脑中的反映。

列宁指出：“**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讨论中，很多教师举一反三，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这种资产阶级偏见的危害。大家回忆起我们学校七四届毕业生分配时，也有一个原来被认为“不怎么样”的学生小黄，他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干革命，有的人对小黄说：“你的两个姐姐已经上山下乡，你可以留在上海了。”小黄回答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应当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有人怀疑他是为了“出风头”，说他是“唱高调”。但小黄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到达黑龙江农村干革命。从孔宪凤的英雄事迹到小黄的革命行动，生动地说明了在党的教育下，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而我们领导和教师如果不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偏见，就看不见青少年身上那种闪光的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可能会扼杀新生的共产主义幼芽。

我们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发扬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因素，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增强他们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而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整一整”的做法。过去有些同志由于受了“师道尊严”的影响，总认为对后进学生是“整”得不够，因此，对学生动不动就给予处分。有的教师平时手头上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学生的缺点错误，为的是可以算老帐、整学生。有的用取消学生学工、学农的权利来压学生。当这些做法行不通时，又感到“难弄”，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师生关系就紧张了。

最近两个多月里，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学习、宣传孔宪凤的英雄事迹和先进思想，引导学生讨论“怎样才能象孔宪凤那样学习、战斗、生活，使青春闪闪发光？”学英雄，见行动，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处处闪光。七五届学生掀起了“学习英雄孔宪凤，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热潮，有一百五十多名同学表示了上山下乡的决心。一些原来比较后进的同学，也纷纷找差距，学英雄，争上游，有了显著的转变。小孔同班有个同学小阙，原来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我们给他记了一次小过。他认为自己已经认识错误还要处分，不服气，撕掉了处分布告。为此，我们又给他记大过处分。在今年学农时，抓住小阙一些缺点，又给他记了一次大过。小阙受到三次记过处分，情绪对立。可是在小孔舍己救战友的精神鼓舞下，小阙在关键时刻毅然跳进水里，先后五次潜入水底把小孔托出水面。这件事对大家触动很大，教师也改变了对小阙的看法，热情地鼓励他、帮助他。开展学习孔宪凤的活动后，他积极宣传英雄事迹，自觉



克服不良习气，努力学理论，学文化，做好事，决心毕业后走上山下乡的道路，现在已经参加了红卫兵。小阙激动地说：“过去我在家里、学校里，看到的都是冷面孔，只听见训斥、处分，于是就抱着‘横竖横’的态度。现在大家满腔热情地关心我、教育我，我要象小孔那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小阙同学的变化，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孔宪凤的榜样鼓舞着同学们奋发向上，而一个同学的转变，又带动了别的同学共同前进，积极分子队伍象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这一系列事实，给了我们领导和教师极为深刻的教育。大家体会到，对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学校中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曾经指出：旧学校“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如果我们采用“整”的办法，实际上是扩大了在师生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使师生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对立的关系，不是把学生争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而是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但是，反对“整”学生，决不是说可以撒手不管，冷眼旁观，而是要引导学生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去做：“**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地做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先进典型，带动一般，依靠群众做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扬青少年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引导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革命传统，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为革命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学生遵守革命纪律的自觉性。

由于集中力量抓了理论学习，抓了思想工作，学生中革命精神大发扬，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也大为高涨。原来有些教师感到“学生难弄，教师倒霉”，对搞好教师工作信心不足。现在看到了革命小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增强了当教师的光荣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有个青年教师原来一直想跳出校门进厂门，工作上得过且过，现在决心向孔宪凤学习，让自己的青春闪闪发光，在教育战线上战斗一辈子。有个老年教师，原来只盼望早点退休，现在她表示“年老志坚心更红，誓为党的教育事业立新功”。大家提高了在斗争中认真学习和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决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通过这样回顾总结，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要端正路线，就一定要认真学理论。特别是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一定要努力学好理论，使学校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在学习中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党支部和全校师生决心继续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密联系学校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学习运动深入下去，使教育革命进一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



科 学 史 研 究

同位素年代学与 人类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

朱炳泉 周新华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历史。物质世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运动，宇宙万物自星云、银河、太阳、地球到微观物质的各个层次以及生物和人类社会，都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对自然发展史的认识上，也必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主席应用人类社会及亿万年自然界的发展史实，精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



随着放射性的发现，现代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门利用天然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等规律来为自然过程计时的学科，即同位素年代学(注)。这门新兴学科数十年的发展及其在自然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历史的认识，用更多、更清楚的事实，进一步表明了“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论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锐利武器。

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只占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很短的阶段，与天体、地球和生物史相比，只是一瞬间。人类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宇宙万物皆生、皆灭、皆动、皆变，每一自然过程都有自己生气勃勃的发展史。为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就必须有相对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的量度。

时间和空间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人类认识时间又总是通过由具体运动形态所测度的相对时间来实现的。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利用日地运行规律，建立了“日晷”等装置来计时，并制订了各种历法。然而，在时空问题上从来就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剧烈斗争。反动哲学家一贯宣扬什么“穷天地终始”、“有理而后有气”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然观；而具有唯物论思想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如荀况、张衡、祖冲之、沈括等人，则重视生产实践和实际观测，坚持“天有其时”、“宙之端无穷”等唯物论的时空观，有的人并创立或肯定了如“大明历”等适合当时农业生产需要的科学历法，其中有些历法所据的原理在数百年后才被西欧所采用。在对反映地层史变化的古生物遗迹的认识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唐宋以来，沈括等人曾对螺蚌壳化石与地球沧桑变化之间的关系作过科学的唯物的论述；然而，反动宋儒朱熹剽窃他们的记载后，却从唯心论出发，炮制出“山勃

(注) 同位素年代学是研究测定自然界岩石、矿物形成年龄的科学。它根据天然岩石、矿物中某些放射性元素(如铀、钾⁴⁰、铷⁸⁷)含量和它们的放射性蜕变产物(如铅、氩⁴⁰、锶⁸⁷)含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计算岩石、矿物的年龄。由于放射性元素蜕变的速度不受温度、压力、化学反应等外界条件的影响，所以能正确计量岩石、矿物的形成时间。



川湮,人物消尽”、地球成为“鸿荒之世”的灾变论,妄图继续维持“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反动统治理论。

在中世纪的欧洲,科学被禁锢在神学之中。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向宗教的“创世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八世纪中叶,康德创立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正象恩格斯指出的,这一假说,第一次动摇了“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反杜林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自然辩证法》)。随后,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农业育种,在客观上为当时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发展积累了资料。在这一基础上,赖尔、达尔文等人创立的“地球均变说”和“生物进化论”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雄辩地说明了自然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

生物的演化必然要反映到地质历史的各种地层的生物化石或遗骸上,这就为衡量地球及生物演化找到了一个有用的相对时标。赖尔等人根据这个时标,采用“将今论古”的方法,阐明了地质发展过程,估算了以亿年计的地球年龄。人们并将地球发展史由老到新地分为前寒武纪(过去认为无生命)、古生代、中生代及新生代(有各种生物群)。与此同时,开始了测定地球年龄的尝试,人们将某些地质历史过程(如海水中的钠盐的积累、海底的沉积物积聚及地球由熔融态到冷却固化)视为单向的均速过程,推算得出地球的年龄为数千万年至数亿年。所有这些进化的、渐变的、“将今论古”的观点,对过去的认识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认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理论日益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人们迫切要求自然科学能提供一种技术,来更准确可靠地测度自然界前后相继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近代自然科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的发现,揭示了原子世界可变、物质不可穷尽这一真理。在这些新的发现面前,资产阶级代言人马赫之流却发出“物质消失”,时空是“主观感觉”等绝望叫嚣,企图使自然科学倒退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那里去。而坚持唯物论的科学家,则极为重视这些新的发现,并开始探索原子的内部结构。随着



原子核理论及放射性研究的深入，人们很快从物质结构这一新层次之中找到了测度地球、天体演化过程的“信息密码”。一九〇二年，有人提出利用天然放射性的衰变规律测定矿物地质年龄的建议，相继开始了应用铀→氦、铀→铅衰变规律测定含铀矿物结晶年龄的尝试，并发现了钾、铷的天然放射性。用同位素衰变规律来测定地质年龄这一新生事物刚刚诞生，就在地质学领域中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传统势力的种种怀疑、非难甚至反对。一九〇八年，美国就有人利用这种新方法还不成熟的缺陷，企图根本否定用放射性衰变规律测定地质年龄的可能性。然而，在社会生产的推动下，加上核物理学的发展，使同位素年代学很快奠定了本身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利用铀、钍、钾、铷等同位素衰变规律度量时间的方法，在地质年代、陨石年代、地球及太阳系历史、生物及人类进化、考古诸方面开始广泛应用。

近二十年来，由于开发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卫星考察以及海洋、环境、工程、水文、考古等工作的实际需要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同位素年代学向许多新领域进军，并因学科的相互渗透而建立了一系列新方法。生产实践中大量的年代学研究成果，为探讨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提供了与日俱增的新资料，有力地冲击着这些领域中的某些传统观念。

二

科学史证明，当一门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资料，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取得新进展时，由于还未能从一个新的高度，从广泛的普遍联系中将分门别类的研究所取得的资料加以“辩证的综合”（《反杜林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总是还要盘踞在那里，不肯退出阵地的。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们往往趁机混水摸鱼，炮制出种种杜林式的“世界模式”与“永恒真理”，妄图把一门科学的新成就绝对化、孤立化，制造新的固定不变的界限和不可认识的界限，甚至把它变成一种阐明陈旧观念的工具。牛顿力学导致了“机械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陷入了“庸俗进化论”，难道不都是如此吗？资产阶级总是借助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来达到其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政治目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在反粒子上大作文章，叫嚷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实际上林彪是极端仇视革命破坏了旧世界、旧制度的“统一”。



虽然同位素年代学诞生以来,大量的矿物岩石年龄测定及其广泛应用,使人们对地质历史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但是,同位素年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传统的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近几十年来,地质学的一些学说中,就充斥着“固定论”、“轮回论”、“直生论”以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烦琐哲学。国内外地质学中的马赫主义者,如旧中国的洋奴、买办丁文江,喋喋不休地喧嚷什么对自然界只能进行“分类”求“秩序”,而不能认识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同位素年代学以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习惯势力往往把同位素年代学只看成是划分各种地质界限和进行分类的“绝对精确”的数字工具,年龄测定不过是为了一幅固定不变的“世界模式”再添加上一个时间“定数律”。某些国外学者不是早就给它戴上了“绝对年龄”的桂冠吗?他们把根据同位素比值所确定的岩石年龄、地球年龄视为岩石和地球的绝对起点。在研究地质史时,他们总是希望同位素年龄划分的地质界限是一个“没有误差”的时间点,并且试图依据年龄的大小来划分出岩浆活动期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一些根据古生物划分界限的研究者,总是希望找到不同“种”、“属”之间的截然差异及它们固定的时间起点和终点。当转向地质空间时,国外某些学者又企图依据年龄数据大小和一些片面的地质现象,划分出所谓绝对稳定的古老“地台”与绝对活动的年轻“地槽”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界限的划分,虽然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具有相对的正确性,但当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之后,就会显出绝对化、固定化的弊病,并出现各种混乱和矛盾。为了弥补漏洞和掩盖矛盾,他们进而搬弄出各种“新”名词和“新”界限,并在定义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企图以烦琐哲学代替自然界的辩证法。在同位素年代学的深入研究中,得到了大量与传统的地质概念不相符合的实验资料,如古老的变质岩可以测得相当年轻的同位素年龄,相反,年轻的火山岩却测得了古老的年龄;同一岩石的不同矿物,同一样品根据不同方法,有时可以测得差异显著的不同年龄;在具有相互穿插关系的地质体中也可以测得互相倒置的年龄等等。在这些“返老为童”、“父子颠倒”的表面现象面前,某些研究者不是去探讨事物的本质,而是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发出了“同位素年龄不可信”、“与地质观察不符”等悲观论调。从“绝对精确”走向“不可信”,这就是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反杜林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

上述种种狭隘概念的产生,从认识根源上说,就是因为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



法的束缚，以致使人们把地球、岩石、生命的形成从物质演化的“长河”中隔离开来，把物质的运动与时间、空间隔离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而不考虑事物总体上的内在联系。“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反杜林论》）同样，地球形成之前，太阳系已经经过了它的无限序列，花岗岩形成前，成岩物质也经过了无限序列，并且岩石形成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变迁。自然界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运动着的物质可以从一种状态转化为人们看来似乎与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地质学中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曾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界限，都被新的观测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如认为前寒武纪没有生命这种界限，被越过显生代界限及更为古老的各种生物化石的发现所突破；传统历史地质学中“变质愈深时代愈老”的概念被许多变质程度相差很大的古老岩层年龄测定打破了；大批年龄数据的统计分布证实的岩浆活动周期性与连续性特点，则打破了不同岩浆活动期之间的截然界限。我们说某变质岩是年老的，只是指变质以前的原岩形成时间较老而言，而后在温度、压力影响下的变质作用已使岩石重新结晶，变成了一种新的岩石体系，因此也可以说它是年轻的。当这种变质作用非常强烈时，可以使岩石发生半熔或全熔而形成面貌全非、很年轻的混合岩或岩浆岩。这样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岩石同位素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可以测得各种不同的年龄数据。这里某一单一的生成时间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只有用演化时间序列才能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人们正是从同位素年代学与旧的传统概念相矛盾的观察资料中，找到了研究地球物质演化时间序列的新途径。在突破原来认为岩石、矿物是绝对封闭体系（即岩石形成后没有任何物质的带出与带进）这一旧概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认识、实践，建立了一系列测定岩石、矿物中同位素体系发生多次飞跃变化与渐进变化的新技术和新的计算理论。根据新的方法，人们可以计算出岩石形成及形成之前的某种变迁和形成以后的变质作用发生的时间。这样，同位素年龄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与物质运动相分离的时间点，而是成了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时间。尽管目前这些理论与方法还不够成熟，但必将导致同位素年代学向新的阶段飞跃。

随着同位素年代学日益摆脱地质学中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它取得的越来越多的新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太阳系、地球、生物、人类以及作为计时



形式的自身——元素与同位素,都有着复杂的发展史。社会革命和自然观的变革,使人类在认识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又进一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现今,依据铅、铀等同位素衰变规律计算的地球年龄约为四十五点六亿年,各类陨石年龄约为四十五至四十六亿年,从月球表土测得的月球年龄也约为四十六亿年左右,并据推算,三者形成时有着相似的铅、铀同位素比值。这表明太阳系星体大约是在四十六亿年前从原始太阳星云中分化出来。这一重要结论,推翻了以往一切根据机械及化学运动所推算的地球年龄的看法,从而也表明地球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什么机械运动的重复。但是四十六亿年是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太阳系起始点呢?同位素年龄的深入研究否定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见解。不同陨石群及各陨石内部所测得的年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太阳系各天体的形成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人们对某些地球上已绝灭核类的衰变产物的研究,又为探索地球及行星形成以前到银河系形成的历史打开了一个缺口。使用这些方法研究的初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地球—月球—陨石体系的形成,仍然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太阳系大约已有五、六十亿年的历史,银河系的历史则更为悠久。所有这些成果,都有力地批驳了那些认为应用同位素年代学无法认识地球形成以前历史的谬论,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宇宙物质的演化同样不是简单重复着某一过程,而太阳系形成之前的物质却有着与今不同的运动形式。

地球从原始太阳星云中分化出来后,仍然处在一分为二的矛盾运动中。目前测定的最古老地壳物质年龄约为三十七点五亿年(格陵兰地块),说明了地球上至少在那个时间就有了地壳。由地球内部的重力能、放射能及自转动能等等导致了地壳活动和地核、地幔的内部运动。全球性的同位素年代学数据表明,地壳中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既有周期性,又有连续性。早期历史上,大约在距今二十六亿年、十八亿年、十亿年左右,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表现为最强烈,这是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一种反映。因此,借助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可以研究地球内部运动的过程。地球近期的岩浆活动,又大约显示出一亿年或二亿年为一周期。分布在海底和世界各大陆的岩石同位素年龄及同位素分布特征,进一步揭示了地球物质存在着大规模的水平运动和上下对流运动。对于这种运动发生的机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我国一部分地质工作者提出,地球内部的运动可以引起自转速度的改变,从而导致海水南北向的进退及表层柔性岩层的纬、经向流动;而另外也有人认为,地幔物质以玄武



岩等形式不断加入到地壳，地壳物质则通过板块运动等再次进入地幔，从而发生更大的迁移，这一运动也使原来连在一起的大陆可分割漂移至千里之外。这些假说，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地球运动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形式。岩石古地磁研究的深入及同位素年代学资料的配合，表明地球的磁极也同样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球南、北极在地质历史中有着较为复杂的迁移及多次倒转。所有这些新认识，都有力地批驳了形形色色的大陆、海洋、地壳、地幔的固定论和永恒论，也使只着眼于地壳升降、褶皱运动的片面的研究进入更广泛更普遍联系的研究领域，打开了禁锢地质学发展的精神枷锁。

我们今天的地球虽已经历了多次沧桑巨变，但它仍很年轻，还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对西藏——“世界屋脊”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经同位素年代学与其他学科配合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地区曾在六亿多年前发生过剧烈的地质变动，而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岩石虽可能已有四亿多年的历史，但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出海成山却只是一千多万年前的事，并且至今仍在上升。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过去一直认为是从寒武纪（约五点七亿年）开始。新的资料证明，生命由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而后自有机界中诞生出来，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五点七至七亿年的前寒武纪地层中，已发现了大批腔肠动物等动物化石，在十亿年的地层中找到了真核细胞（绿藻）的化石，在十至三十二亿年的地层则有各种形态分化的细菌及蓝绿藻化石。近来，在非洲南部年龄达三十二亿年的地层中，已发现属原核细胞的细菌化石。至于更为古老的陨石及月球岩石，人们已从中分离出多种构成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与核酸的主要有机化合物，如氨基酸、嘌呤及嘧啶等。这幅自然界从化学进化到生物进化的图景，表明了各种形态的生命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近年来，由于同位素年代学在技术上的进展，有力地配合了古人类学的研究，因而加速了对早期人类进化史认识上的深化。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劳动使猿进化为人，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研究人类史，必须考察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过去一直认为，人类只有四十至五十万年的历史，最早在我国发现的“北京猿人”大约就是这一时代的人类。然而“北京猿人”不但能制造工具，而且已经使用了火。“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



界分开”（《反杜林论》）。可见北京猿人已经是比较进化的人类。现已确证，在猿开始制造工具向人进化到“北京猿人”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六十年代初以来，在非洲东部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能制造工具的“古猿”——人类的祖先。根据同位素年代学和古地磁的资料证明，东非“古猿”至少已有二百六十万年的历史。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人类史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自然辩证法》）。地球、生物、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地质体都是永恒运动中的有限存在形式，只有把握住它们之间质的差别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历史。

三

正如现今的天体、地球及生物已经经历了演化的无限序列一样，宇宙间的各种形态的物质肯定要向各自的“明天”转化。人类对自然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将继续无限地深化。用同位素年代学来探索太阳系、银河系以至宇宙的发展史还仅仅是开始，现有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多缺陷。由于人们对宇宙演化过程中核子转化及“基本粒子”转化的规律认识还不充分，有关天体演化过程的时间量度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可以相信，随着人类对物质世界无限层次的认识的深化，将会找到测度各种演化时间过程的更多新方法。然而，近几十年来国外风行着形形色色的“宇宙论”，推算出什么“宇宙年龄”、“宇宙半径”，大谈“物质创生”、宇宙运动开始于“宇宙大爆炸”，等等。不难看出，这些“学说”不过是唯心论和宇宙有限论者的庇护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象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利用这些披着时髦科学外衣的荒谬结论为“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此，必须从政治上、哲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批判这些唯心主义的谬论，揭露它们的反动本质。我国对时空理论和天体演化理论的研究，必将在实践和战斗的批判中获得发展。

随着天体物理和核物理学研究的深入，多年来已提出了有关物理学常数（如引力常数、同位素地质年龄计算中常用的放射性衰变常数等）有无可能随时间发



生变化的问题。根据大量实践中所发现的一些矛盾现象，同位素年代学也从另一侧面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常数”不常，这从辩证法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反常”现象，并不象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会推翻同位素年代学的理论基础。列宁早就告诫我们：“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此，任何悲观的情绪和否定同位素年代学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作为科学发展一定阶段产物的同位素年代学，将来必然也会被更新的、更接近绝对真理的计时学科所代替。

当前，我国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还应以地球为主要对象。地球——这一人类的摇篮，是几千年来自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地球的结构、早期状态和内部动力学过程等均了解甚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资源开发、地震预报、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地球的演化规律。即使对研究天体演化史而言，首先从地球史着手显然也有重要的意义。地球参与了太阳系的演变过程，并且至今还不断接收到大量来自太空的空间物质。因此，对于地球初期演化史及地球—月球—陨石系统的确切认识，无疑将是打开太阳系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然而，在国际上，美苏两霸打着开展空间、海洋和全球性“科学研究”的幌子，为它们争霸大陆、海域、外层空间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并制造全球性公害和散布种种“地球毁灭”、“能源枯竭”等无耻谰言，企图以此来掩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处于总危机的真相。对此，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积极开展对渗透在自然科学中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自觉地应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来研究和分析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 国际述评 ·

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

梁 效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业已蜕变成到处进行侵略扩张、竭力争夺世界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可是，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很害怕“霸权”这个词，一听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这丝毫也不奇怪。他们“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对“霸权”一词讳莫如深，这正好说明世界人民奋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由于它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因而又有着它的某些特点。

列宁说：“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在帝国主义国家，是金融资本统治一切。它在政治上，必然走向全面反动；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必然“力图兼并一切国家”。垄断的这一根本特征，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身上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苏修今天在“力图兼并一切国家”。它在“经互会”国家中大搞什么“共同所有”、“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进行兼并。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苏修在它的对外贸易中，单是不等价交换一项，就使东欧五国遭受一百九十亿美元的损失。对苏修来说，贸易和“文化交流”不



过是渗透的渠道，“援助”和贷款不过是资本输出的别名，“友好条约”不过是控制、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至于所谓“华沙条约组织”，既是苏修进行经济兼并的军事后盾，又是它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侵略工具。它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样，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妄想建立起老沙皇所梦寐以求的殖民帝国。苏修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它社会帝国主义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而苏修的这种到处搞侵略、颠覆，不断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也就埋伏着它的彻底失败。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的统治代替了自由竞争，但竞争仍然存在，而且竞争的规模、深度、强度和破坏性更大更凶。列宁指出：“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都是垄断资本主义，两国的大资产阶级都力图在垄断本国经济的基础上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它们必然展开全面、激烈的竞争。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扎根于这种竞争和垄断不可分割的现实联系之中。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筵席上的迟到者。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苏修首先向许多昔日的“兄弟国家”开刀。它对“经互会”一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军事占领和经济兼并，使它拥有一个排斥其他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苏修还竭力打入美帝的势力范围，大挖其墙脚，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大肆进行渗透和扩张。这样，两个超级大国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必然愈演愈烈。它们**“为了垄断一切，就不仅要国内市场上（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它们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重点是在欧洲，包括地中海和欧洲的侧翼中东、波斯湾。勃列日涅夫曾公开宣称：欧洲问题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着一个中心位置”。苏修兵力的四分之三本来就放在欧洲，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又以每年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速度继续增加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美苏两霸这样剑拔弩张地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美苏两霸是今天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开了多年最近才收场的所谓“欧安会”，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军事集团划分势力范围的别名，实际上是欧危会。苏修到处鼓吹什么“持久和平”、“安全”、“缓和”，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其目的都是掩盖它日益加紧的扩军备战和战争政策。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出，如果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



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霸权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更不是取决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苏修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帝国主义规律起支配作用的必然结果。美苏两霸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争霸史的继续和发展。“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

二

今天苏联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形成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和人的关系以及分配方面，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统治。这一经济结构本身的特点，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具有更加横暴的性质。

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性强，集中程度高和国家控制紧。它的一切经济命脉，包括军事工业，都是由掌握国家机器的苏修叛徒集团直接控制的。这个特点使得苏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有类似之处：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它低于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性方面，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高于美国”。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这种“交错”，以私人垄断为主，而国家垄断实质上是私人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构作为自己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这种国家垄断，经常地、大量地采取加工订货或者减税、补贴等方式，使国家机构为私人垄断资本服务。即使由于特殊情况，例如发生战争或危机时，在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实行一定时间或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也“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采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只是统治几个生产部门或几十个行业，而是几乎囊括了整个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公用事业和国营农场等等。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几个大财团并立的情况不同，苏修的垄断资本是由一个中心集中控制。这个中心，就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垄断全国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后果之一，是使苏联亿万人民生活 在极端专横的垄断统治和经济强制之下。粮食匮乏吗？消费品奇缺吗？反正就生产这么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管人民怨声载道，他们照样榨取垄断利润。垄断必然导致腐朽。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不能不使它的国民经济出现腐朽停滞趋势。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便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兼并新的领土，掠夺国外的廉价原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和转嫁危机。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向第三世界输出的资本总额达一百三十多亿美元。通过资本输出扩大商品输出，把大量的滞销品倾销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高价出售到这些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达一百六十多亿美元，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高额利润。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后果，是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在今天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新沙皇的剥削率，超过了老沙皇的一倍。苏联农庄庄员的半数以上和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生活在官方承认的贫困线以下。市场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国内市场的日益相对缩小，必然促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倍疯狂地去抢占国外市场，从而同美帝发生剧烈的贸易战、投资战、资源和海洋争夺战。

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结合，使得苏修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可以把经济力量同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汇集起来，在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成为与美帝争霸并在争霸中采取攻势的超级大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就是通过这条相似的途径跃登世界头等帝国主义强国“宝座”的。正如列宁所说：“德国的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结合了起来，于是德国走到前面去了。”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大量事实证明，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上、政治上的这些特点，成为刺激它疯狂向外扩张侵略、拚命争夺霸权的强烈兴奋剂，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的核霸王角色，正在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

三

苏修疯狂地推行扩军备战和侵略冒险政策，这是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本性决定



的，也是苏修经济上的腐朽性、落后性的一种反映。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实力落后于它的对手美帝国主义，它要称霸世界就必然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为它的军国主义化提供了条件。勃列日涅夫叫嚷：“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也就是说，把加紧准备侵略战争放在首位。为此，苏修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使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战争经济。

目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而它的军费开支却同美国不相上下。据估计，苏联的军事开支约占其当年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苏联全部工交企业的百分之六十都直接或间接用于军工生产。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五三年以来，苏联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许多就是用于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十几年来，苏修仅用于核武器方面的开支就达一千多亿美元，它的洲际导弹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海军舰艇吨位十年来增加了近一倍，核潜艇在四年间增加了四倍半以上。另一方面，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下降，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民用工业部门由于不断受到军火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资金和劳动力严重不足，许多陈旧设备得不到更新，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苏修当局一再压低生产指标，还是经常完不成任务。同时，由于产品质量低劣，又造成大量积压。苏修的农业更是长期落后，特别是粮食产量极不稳定，经常依赖进口。所有这些，使苏联经济的发展更加畸形，而长期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的必然恶果。

苏修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必然使它的庞大军事工业出现生产“过剩”。为了给那些技术陈旧的“过剩”军火寻找出路，苏修成了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军火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苏修出售的军火达二百八十五亿美元，仅在中东地区，苏修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期间输出的军火就达六十七亿美元，比它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二年为止的十多年内向中东销售军火的总额多十四亿美元。苏修还乘机敲诈勒索，要购买军火的国家用农产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汇付款，从中牟取暴利。

一个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大国，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而妄图用武力称霸世界，这是老沙皇走过的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沙皇俄国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然而，经济上的落后丝毫没有使老沙皇的野心有所收敛，相反，它使沙皇俄国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军事上更富于冒险性，经济上更加贪婪。当时，“**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在这方面，苏修新沙皇完全步老沙皇的后尘。沙皇俄国曾经依靠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今天，苏修新沙皇的这一“荣誉”，比起他们的前辈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修无限制地扩张军备，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剩余价值以后，又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多一层剥削。据苏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苏联一九七四年的居民税竟比一九六〇年增加近两倍。苏修还通过抬高物价、推迟偿还公债等手段肆意搜刮。同时，为了缓和经济上面临的困境，苏修不得不以高额利息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这就使苏联劳动人民变成了新的债务奴隶。所有这些层层盘剥，使苏联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日益严重，从而加深了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

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十年，是苏修疯狂扩张的十年，也是它到处碰壁、内外交困的十年。在国内，苏修的两个五年计划连年落空，农业生产十年中有六年减产，今年的收成更糟。它的整个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人力和财力不足**”。苏联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使苏修新沙皇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在国际上，第三世界作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在斗争的实践中越来越认清了披着“天然盟友”外衣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把斗争的矛头日益指向这个危险的敌人。第二世界近年来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使苏修向西欧的侵略扩张遭到了抵制。东欧国家和人民反对苏修控制、压迫的斗争日益增强。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别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其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它妄图称霸世界，其结果只能把更多的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而把另一端交给世界各国人民，最后逃脱不掉灭亡的命运。

